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学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常本春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思东 陈 思 郭晓东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5年第1期 总第153期
双月刊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任编辑:蒋建忠 王天海 徐晓婷 赵晓锋
张 丽 杨 玲

统战理论与实践

- 文化主体性视域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建构 / 罗 兰 4
-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总体性建构——基于大历史观的分析视域 / 王 东 14
-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适应性的三重逻辑 / 龙雪岗 金 文 21

政党制度

- 以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与路 / 付 瑀 邹丽芬 30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 年 2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中国式现代化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再考察 / 赵 立 39
-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成审视、内在机理与实施进路 / 李明旭 48

中华文化

-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唯物史观向度 / 徐龙建 57
- 实然·应然·必然：“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三维辨析 / 胡成琢 郑天骄 63
-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出场语境和呈现样态 / 谢欣桦 邓显超 72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5 - 01

文化主体性视域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建构

罗 兰

摘 要: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是由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创、共享和共用的视觉形象构成,用于叙述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与情感的多元一体的视觉表达系统。聚焦“文化主体性”的研究视域与“建构”的现实导向,从历史溯源、理论探析深入挖掘与剖析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的形成与规律,提出以“图”载趣、革新叙事内容,以“技”载道、升级叙事媒介,以“情”载理、强化叙事逻辑,从而在叙事内容、叙事媒介、叙事逻辑三个方面建构有形、有感、有效的文化生命体,彰显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的文化主体性。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图像;记忆;情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2]。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交织的当下,构建彰显鲜明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意义重大,不仅能够巩固民族文化自信根基,强化文化认同共识,满足国际文化竞争的现实挑战,更能够拓展与深化中华文化符号体系,提升中华文化辨识度与影响力。此外,还有助于深化探索与实践验证文化主体性理论,为文化繁荣与全球对话贡献中国智慧。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作为承载与理解中华民族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关键媒介^[3],是中华各民族

收稿日期:2024-12-12

作者简介:罗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作者简介: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建构及其价值意义研究”(24CKS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创、共享和共用的视觉形象构成的多元一体的视觉形象体系^[4]。为在当代社会语境中有效叙事与传播，需系统性地提炼历史精髓与当代实践精华，形成具有标志性的符号与形象库^[5]，这些视觉表达不仅映射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圣化及共源性视觉元素的创造性再现^[6]，亦是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深化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叙事基石^[7]，但在现代叙事中需谨防视觉中心主义，应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视觉形象文化范式，促进二者和谐共生^[8]。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文化主体性问题进行了集中阐释，学术界对于文化主体性的研究由此走向深化和拓展。文化主体性是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9]，指向文化层面彰显当代中国作为主体的特殊性质^[10]，也有学者认为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品质及独特价值体系^[11]，要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叙事逻辑^[12]，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建构奠定叙事根基，指明建构方向。对此，有学者作出尝试，在中国电影中以中国风中国画中国声的具象表达展开对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文化主体性叙事^[13]，并深谙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国家向国际社会展示自身形象的重要手段^[14]。

从上述研究动态来看，建设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与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价值，在研究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均有涉及，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跨学科、国际视野的研究趋势，但仍存在问题：学理层面的系统性、全面性研究尚显不足。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竞争，一是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的建构任务愈发紧迫；二是文化主体性研究虽然剪热度高，但现实应用价值亟待挖掘；三是视觉形象叙事作为文化遗产与创新的关键媒介，其文化承载与内容输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鉴于此，本研究提出文化主体性视域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建构研究，聚焦于“文化主体性”的研究视域与“建构”的现实导向，

深入挖掘与剖析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的历史脉络、生成过程与现实路径，通过学理探究与现实推进，探索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交流及文明互鉴的新范式。

二、历史溯源：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的文化传承与发展脉络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记录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文化遗产，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风貌，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这种叙事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文化的延续和创新过程，它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传统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从史前时期的岩画、陶俑，到历代的绘画、雕塑，再到近现代的摄影摄像、数字影像等，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对美的追求与对文化的传承展现出历史必然性。每一代艺术家和创作者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与表达，推动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这一过程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与珍视，更是对未来的期许与展望。

（一）史前至先秦时期：萌芽与初步形成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的滥觞可追溯至史前纪元，“早期部落群体对于自我和他者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以我为中心、‘只美其美’的初级自我意识阶段”^[15]，勾勒出对自我及他者的初步视觉诠释。这些初态形象，或呈自我镜像的质朴描绘，或现他者印象的简约勾勒，虽显碎片化与初级性，却孕育了族群认知与区分的视觉萌芽。随着生态调适、战争冲突、商贸往来、联盟构建、迁徙融合及文化互动的深化，族像、族徽、守护神灵、标识性器皿及装饰模式等视觉元素，逐步演化为族裔认同与族群区分的鲜明文化标识。

在原始岩画艺术中，线条的运用轨迹鲜明地勾勒出先民视觉表达从具象模拟向抽象概括的演进历程，不仅展示出先民对自然物象的初步捕捉与再现能力，更蕴含向内心情感与观念抽象化表达的深刻转型。尤其在神话传说的丰富想象中，

先民的意象构建技艺与审美想象能力得到显著拓展,以“象”为媒介,超越物质形态的限制,构建起一套独特的“以象寓意”审美思维体系。及至先秦时期,甲骨契刻与金文铸铭的广泛运用,标志着文字作为记录族群关系、传承历史记忆及表达视觉意象的重要媒介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商代甲骨文以其独特的契刻技法与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原则,不仅记录当时的社会生活、宗教祭祀、战争征伐等历史事件,而且通过其形态各异、线条流畅的字符,展现先民们对于自然万物的敏锐观察与抽象概括能力,深刻映射出该时期视觉思维的原始活力与独特风貌。这一时期的青铜礼器,如鼎、尊、簋等,其上所铸铭文与繁复精美的纹饰相互辉映,共同构建了一个既具实用性又富含审美意蕴的艺术世界,体现了商代审美意趣的多元融合与高度发展。随着礼制的系统化构建与完善,周代视觉审美理念与原则得到进一步的精进与升华。周人强调“礼乐相成”,将视觉艺术作为礼制教化的重要载体,通过规范化的纹饰设计、色彩运用及构图布局,传达出等级秩序、道德伦理与审美追求。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如毛公鼎、大克鼎等,其纹饰更加细腻繁复,构图更加严谨和谐,不仅展现高超的铸造技艺,更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确立视觉艺术表达的新高度。此阶段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特征鲜明,既受限于当时认知框架与记录技术,呈现出碎片化记录的特点,又通过自然崇拜、神灵信仰及祖先模拟等手法,赋予这些形象丰富的象征意蕴与深远的文化内涵。例如,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凤鸟纹等,不仅是自然物象的抽象化表现,更寄托了先民对于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崇拜,以及对于祖先英雄的缅怀与追思。在这一时期,族群间广泛的文化互动与深度融合,如中原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极大地丰富视觉形象的多样性与表现力,促进文化符号的跨族群传播与融合创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史前至先秦时期的视觉形象叙事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与文化传承脉络的“活化石”与“镜像反映”,不仅限于历史的直观再现,更是后世艺术创作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灵感宝库”与“思想富矿”。这一时期的视觉叙事运用“象征机制”与“视觉符号体系”,通过“隐喻”“象征”“图腾崇拜”等手法,深刻揭示先民如何以有限的图像语言传达出无限复杂的情感观念与集体记忆,展现了高度的“视觉叙事”智慧与“文化编码”能力,为后世的文化创造与理论探索提供丰富范式与深刻启示,其中“图腾崇拜的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人们生存的基础之上”^[6]。

(二) 秦汉至隋唐时期:发展与繁荣

秦帝国的统一构筑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基石,更激发全国范围内文化的广泛流通与深度融合,为视觉艺术领域奠定统一风格与多元发展的双重基础。秦始皇陵兵马俑中秦军威武的军容,体现出秦代雕塑艺术的精湛技艺与统一风格。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汉代积极促进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通过政策扶持与创作激励,如汉画像石与画像砖,通过生动的图像叙事,记录当时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与神话传说,推动视觉叙事艺术的进一步成熟与深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不安,却意外催生文化艺术领域的深刻变革与创新。这一时期宗教艺术的蓬勃发展尤为显著,不仅极大地丰富叙事画的内容维度与思想深度,还促进绘画技法与表现手法的革命性突破,为叙事画开辟了全新的艺术境界。敦煌莫高窟的兴建成为宗教艺术蓬勃发展的典型例证,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通过宗教题材的广泛引入、宏大的构图、细腻的笔触、丰富的色彩挑战传统绘画边界,探索更为复杂、深邃的叙事结构与情感表达。隋唐时期,文化艺术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唐代,人物画特别是叙事性人物画达到技艺的巅峰。阎立本的《步辇图》作为叙事画的杰出代表,以其精湛的技艺以及生动的历史场景展现了唐代绘画的高超水平。同时,张萱、周昉

等画家的仕女画，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情感以及精湛的技法，描绘唐代贵族妇女的生活和形象，展现唐代绘画的多样性和深度。这表明叙事画开始摆脱单一人物肖像的局限，向更复杂、连贯的故事情节拓展，展现艺术家们卓越的叙事才能与非凡的艺术创造力。

此阶段，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的特点鲜明地体现为写实性、叙事性与多样性的高度统一。随着绘画技艺的精进与审美观念的演进，视觉叙事逐渐超越简单的形象再现，转而追求情节的连贯、情感的共鸣与思想的传达。地域文化的交流与民族融合的加深，也为视觉形象的多样性注入新的活力，形成多元共生的艺术风貌。可以看出，秦汉至隋唐时期的视觉形象叙事不仅是对复杂情感与故事的精湛表达，更是艺术家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生动写照，不断突破传统束缚，尝试新的表现手法与题材内容，为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丰富的灵感与宝贵的经验。

（三）宋元明清时期：传承与演变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尤其是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文化艺术向世俗化、多元化及创新性转型的关键驱动力。宋元时期，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的形成，文化艺术创作日益贴近民间生活，反映出广泛的社会需求与审美取向。绘画艺术在此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技法日臻完善，不仅继承前代的精华，更在此基础上创新出诸多新画派与风格。宋代的山水画在“意境”营造上达到巅峰，不仅体现在对自然景色的高度概括与提炼，还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哲学思考与审美情趣；而元代的文人画则强调笔墨意趣与个人情感的抒发，体现艺术与生活的深度交融。

及至明清，尽管政治环境趋于封闭保守，但文化艺术在民间却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版画与年画作为民间信仰、审美趣味及生活习俗的载体，通过色彩鲜艳、构图饱满的画面，传达出吉祥、喜庆、祈福等寓意，不仅丰富视觉叙事的表

现形式，更成为连接城乡、沟通雅俗的重要媒介。这些民间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民俗风情及民众的精神世界，展现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世俗性与多样性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随着地域文化的广泛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深化，视觉形象叙事风格的多元化得到进一步拓展。

宋元明清时期，艺术家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断突破传统束缚，尝试新的表现手法与题材内容，运用世俗化的手法，以生动直观的形象语言，深刻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展现高度的艺术责任感与使命感。例如，清代画家石涛提出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理念，鼓励艺术家深入自然、观察生活，以独特的视角和技法表现自然之美与人生百态。在技法上，注重细节刻画与情感表达，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为后世留下众多珍贵的艺术遗产。这一时期的视觉形象叙事凭借其世俗性、多样性与创新性的笔法与视角，既是对前代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刻反映与独特诠释。

（四）近现代以来：变革与创新

随着西方文化的广泛渗透与现代化进程的疾速推进，传统视觉叙事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外在形式上的冲击，更是内在理念与表达方式的深刻变革。引入西方绘画技法精髓并非简单的技术移植，而是基于深刻理解与尊重双方文化基础上的融合创新，通过巧妙地将西方光影处理、透视法则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意象表达、笔墨情趣相结合，创造出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为中华传统视觉艺术注入新的活力。这个融合过程不仅丰富了艺术表现形式，更立足国际视野，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与理解。

“视觉叙事是借助视觉性来进行叙事活动”^[17]，摄影、电影、动画等媒介的兴起为视觉叙事语言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些新兴媒介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表现形式，极大地拓宽叙事表达的边界，通过光影交错、色彩运用、构图布局

等手法,构建出既真实又浪漫的叙事空间,使受众在视觉与情感的双重冲击下获得深刻的艺术体验。这种动态、立体、互动的叙事方式,不仅满足现代受众对于视觉艺术的多元化需求,也推动视觉叙事语言向更加成熟和完善的方向发展。随着时代发展,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的核心特征可概括为融合性、创新性与国际化。“激活中华文明在现代性语境中的独特优势”^[18],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之间架起桥梁,通过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荣,积极借鉴国际先进艺术理念与技术手段,同时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创新的方式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呈现于世界舞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表达。视觉形象叙事的审美观念也经历从单一到多元、从内敛到开放的深刻转变,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意境追求,而是更加注重个性表达与情感抒发,通过独特的视觉语言探索人类共同的精神命题,数字艺术、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的运用为这一转变提供有力支撑,使得视觉叙事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触及内心,实现更为深刻的心灵共鸣。

三、理论阐释: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的生成过程

在当代社会的多元语境下,视觉形象叙事正深刻渗透并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景观与生活实践。为系统且深入地探索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生成的根本规律,需细致剖析视觉形象叙事的基本流程与核心要素,为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石与指导框架。

(一)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的主要理论来源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的理论根基根植于深厚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学术探索之中,不仅汲取符号学关于符号与意义关系的深刻洞见,还融合叙事学关于故事构建、情节发展的理论精髓,阐释认知心理学对视觉感知与心理加工的影响,进一步丰富文化主体性视域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建构的理论内涵。

一是符号学。图像、色彩、构图等视觉元素

都被视为符号,通过特定的组合和排列来传达特定的意义和信息。在符号学理论的框架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表现为一种复杂而动态的文化符号系统,通过视觉艺术形式的多样表达,如传统建筑、服饰、绘画、雕塑及现代影视、数字媒体等,传递并强化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民族特性。符号学强调符号的“指示性”与“象征性”,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中的每一个符号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与历史积淀,是民族精神与智慧的具象化体现,在不同语境下的互动与转化,不仅丰富视觉叙事的层次与维度,也促进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在符号学框架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应注重分析符号与意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视觉符号如何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构建并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二是叙事学。在叙事学理论的框架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被视为一种以视觉符号为媒介的叙事活动,通过讲述故事、构建情境、塑造角色等手段来传达文化意义、价值观念及民族特性,“故事”与“话语”是叙事学的核心要素。在故事层面,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聚焦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深度的叙事内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人物形象、文化符号等,讲述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文化传承与民族精神,承载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在话语层面,关注视觉符号的选择与运用、叙事结构的安排与构建以及受众的接受与解读,以色彩、构图、光影等元素的视觉语言设计,巧妙营造出独特的视觉氛围和叙事节奏,赋予视觉与情感的双重体验,增强文化认同与深化民族情感。因此,从叙事学出发,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要基于叙事本质、形式、功能,关注如何构建故事、塑造人物、设置情节等叙事策略传达主题和情感。

三是认知心理学。在视觉感知与注意力分配上,大脑皮层的视觉加工区域对信息的快速识别与分类,以色彩、线条、形状等视觉元素吸引注意力,触发初级的视觉感知过程。而记忆编码与

长时记忆方面，受众在感知视觉形象的同时，会对其进行认知加工，将相关信息编码为记忆痕迹，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象征意义的视觉符号更容易被深度加工并存储于长时记忆中。1781年，康德提出“图式”概念，是连接概念和感知对象的纽带。巴特莱特在1932年首次提出图式理论，将图式定义为“对过去的反应和经验的积极组织”，并将其引入记忆与知识结构的研究。在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中，文化图式作为对中华文化共享知识的结构化反映，匹配的文化图式加速信息处理与深入理解，而不匹配则可能触发认知冲突，促使个体重新评估信息。

(二)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的文化生成

文化生命体作为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外在表现，主要体现为文化价值观念、文化知识体系、文化实践活动三部分内容。在文化主体性视域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建构应聚焦于文化主体的构建主体与本土化的叙事语境，凸显“创造什么样的叙事以及怎样叙事”的文化内核主体性，把握文化生命体显性的建构效能，明确叙事核心要素，梳理生成机制（见图1）。

“图像”作为视觉形象叙事的首要表征，不仅是物质形态的直接展现，更是文化符号与精神内涵的载体，通过色彩、线条、构图等视觉元素，生动再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场景、生活风貌与审美追求，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物质与精神的桥梁。图像以直观可感的方式呈现于观者眼前，是物质世界在视觉艺术中的直接映射。“提高对中华文化

的认知需要在精神文化上加深理解，也需要在物态文化上加大感知”^[19]，无论是古老壁画上的神话传说，还是现代摄影镜头下的城市风貌，图像都以具体、明确的形态记录并再现了现实世界的种种景象，为文化传承提供可触可感的物质载体，是文化符号的集中体现，各种图像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例如，在一定语境下，龙与凤的图案代表着皇权与吉祥，梅花与竹子则象征着坚韧与高洁。图像通过色彩、线条、构图等视觉元素的巧妙运用，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传递与呈现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更进一步来看，图像是精神内涵的深层表达，超越物质世界的限制，将内心的情感、思想和理念转化为色彩、线条、构图等可视化的形式。在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中，图像往往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民族情感，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展现中华民族的生活实貌、精神世界和文化品格，人民群众不仅能感受图像美的愉悦，更能直观感受祖先们的生活场景和文化氛围，深刻体会到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力量。

“记忆”作为叙事过程中的关键媒介，承载着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文化遗产。它既包括个体对过往经历的回忆，也涵盖了族群对历史事件、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共同记忆。记忆的触发与激活机制呈现出一种动态且复杂的互动过程。在视觉形象叙事中，记忆通过图像的触发与激活，以色彩、线条、构图等视觉元素巧妙运用搭建物质世界的拟态图像，生动再现过去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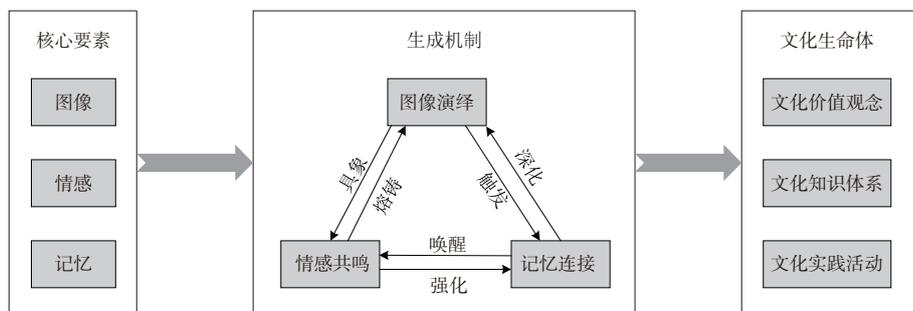


图1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的文化生成图

场景、文化传统和审美追求，深度挖掘与重新诠释记忆内容，唤醒内心深处与日常生活中的集体记忆。图像作为记忆的触发器，凭借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瞬间捕获观者的注意力，带领其进入深度沉浸的观赏状态。在此过程中，观者不仅是在审视图像，更是在与自身记忆及族群共同记忆进行深刻对话与共鸣，图像所触发的记忆片段唤醒深层的民族基因，促使受众重新审视并深刻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此外，记忆具备创造创新与传播传承的双重叙事效能。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在尊重历史事实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记忆内容的深入剖析与创造性重构，巧妙融合个人创造力与想象力，对记忆素材进行精细的艺术提炼与升华，在生动鲜活的视觉表达中赋予记忆鲜明的时代烙印与现实关联，跨越时空所限，与当代社会语境产生深刻共鸣。

“情感”作为叙事旨归所在，是图像与记忆最终指向的深层内核。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与传达，激发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无论是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还是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都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升华与强化。情感作为叙事的核心驱动力，具有深刻塑造受众的认知体验、强化情感共鸣与促进价值观的传递与内化的复合效能。视觉形象叙事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与表达，构建一个充满情感张力的叙事空间，使受众在情感沉浸中深化对故事内容的理解与感知，形成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认知体验；触发受众内心深处的感情共鸣点，拉近讲述者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加深对故事内容的记忆与理解，促进对作品所传达情感、思想及价值观的认同与接受；进而巧妙地融入叙说主体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判断，使受众在情感共鸣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并内化这些价值观，实现叙事的教育与引导功能。正是情感这一叙事的核心驱动力，促使中华民族视觉形象超越静态界限，跃动于历史长河与文化织锦之中，成为民族文化精神传承与弘扬的生动

载体。在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中，情感作为灵魂，赋予图像以生命，使记忆更鲜活，最终实现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诠释与弘扬。

四、现实导向：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的建构路径

面对当前杂糅多元的文化语境以及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现实需求，围绕“如何叙事”“什么样的叙事”的叙事命题，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从叙事内容、叙事媒介、叙事逻辑三个方面建构，打造有形、有感、有效的文化生命体，契合其叙事的文化生成，彰显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的文化主体性。

(一)以“图”载趣：革新叙事内容，夯实文化价值观念

以“图”载趣旨在革新叙事形态，以生动的视觉图像传达中华文化的趣味与魅力，融入现代审美与价值观，使文化元素焕发新生。由此可以创造出既具民族特色又符合国际潮流的视觉符号，夯实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增强文化自信。

首先，挖掘提炼民族视觉元素，构建系统性民族文化视觉元素库。一是解码文化基因，运用文化人类学、符号学等方法，深入剖析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与核心意涵，识别并解码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视觉元素，如传统图案、色彩体系、书法笔触等。二是元素分类与编码，对挖掘出的视觉元素进行科学分类与编码，建立层次清晰、易于检索的民族文化视觉元素数据库，确保元素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可复用性。三是价值评估与筛选，基于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及现代适应性等多维度标准，对元素库中的内容进行评估与筛选，保留最具代表性和创新潜力的视觉元素。

其次，创新融合视觉符号，打造兼具现代化与国际视野的视觉图像。“文化符码作为民族集体经验与共同回忆的具体元素，符码意蕴的更新与优化必然会引起叙事路径的变化”^[20]。鼓励跨界合作，将传统视觉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数字技术等相结合，创造出既保留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

审美趋势的视觉符号符码；同时，研究国际视觉语言趋势，调整视觉符号的表达方式，增强视觉图像的互动性和沉浸感，使之既能被全球观众理解接受，又能有效传达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

最后，整合勾勒视觉元素图谱，深化与演绎视觉图像的故事化表达。基于民族文化视觉元素库，设计具有连贯性和深度的叙事框架，将视觉元素有机融入故事之中，形成完整的视觉叙事体系。围绕民族文化特色，运用故事化、情感化的叙事手法，精心培育具有鲜明个性和广泛影响力的文创形象，这不仅能够提升文化内容的吸引力，也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从而夯实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增强文化自信。

（二）以“技”载道：升级叙事媒介，推广文化知识体系

以“技”载道意味要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升级叙事媒介，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叙事传播网络，推广中华文化知识体系。

首先，深化中华文化知识体系分析，明确叙事目标与受众特性，强化自主研发与技术革新，培育跨领域复合型人才。基于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视角，对中华文化知识体系进行全面分析，识别其核心要素与独特价值，重构适应现代叙事需求的知识体系框架。明确叙事传播的具体目标，通过市场调研与受众分析，精准细分受众群体，理解其需求与偏好，在此基础上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推动技术在视觉形象叙事内容生产、传播渠道、用户反馈等方面的创新应用。同时，培育“文技双馨”的复合型人才——既深谙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韵味，又熟练掌握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与应用，为叙事媒介的全面升级与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与创意源泉。

其次，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实现资源高效整合与优势互补。制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的战略规划，明确融合路径与阶段性目标，确保中华民族视觉

形象与叙事媒介融合过程的系统性与有序性。整合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资源，构建集文字、音频、视频、互动等多种形态于一体的全媒体传播矩阵，推动视听形象叙事内容共享、渠道互通、技术互补，实现资源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优化配置，提升中华文化知识体系的传播效率与覆盖面。

最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叙事传播网络，强化多渠道、多平台、多形式的协同传播，在深入互动中形成立体化的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生态。根据受众分布与传播环境，科学布局传播网络，确保中华文化知识能够覆盖国内外各类受众群体。针对不同渠道、平台与受众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叙事媒介与传播策略，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协同叙事机制，促进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叙事媒介的紧密配合与高效互动，以饱满鲜活的视觉图像，丰富与满足受众的感官体验与精神愉悦，在全面互动中合力推动中华文化知识体系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影响。

（三）以“情”载理：强化叙事逻辑，深化文化实践活动

以“情”载理强调要在叙事过程中注重情感共鸣与逻辑严谨的结合，在参与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形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首先，深化制度保障，实现情感与理性的深度交织与有机融合。视觉形象叙事不应仅仅强调图像的“感性支配”，忽视理性思辨与价值导向，而是通过“情”之载体，促进对“理”的深刻领悟，实现情感与理性并蓄的双轮驱动。制定相关政策，明确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建构的目标、原则、任务及实施路径，以文化主体性为核心，树立兼容多元一体、时代特征和国际化视野等的指导理念，以情感为引导，促使受众在感性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中华文化的思想深度与价值维度，确保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的构建既满足文化传承的内在需求，又契合制度规范与全

球视野，构筑全面且深刻的文化认知框架。

其次，强化叙事逻辑，构建情感共鸣的基石。叙事逻辑的首要任务是梳理中华文化的深厚脉络，明确叙事的主线与副线，挖掘历史典故、民族传说、艺术作品等丰富资源，提炼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内核与文化精髓的叙事元素，形成一条贯穿古今、连接各民族的情感纽带；精心编排故事情节，设置合理的矛盾冲突与情感转折，以增强叙事的情感张力，通过可观可感的视觉图像讲述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现英雄人物的壮举、描绘日常生活的温馨场景等，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使他们在情感上认同并接受所传递的文化理念。此外，叙事节奏的快慢、强弱直接影响到情感氛围的营造，因此，在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建构中，注重把握叙事节奏，通过快慢结合、张弛有度的叙事方式，营造出既紧张又温馨、既庄重又亲切的情感氛围，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沉浸于叙事所构建的世界之中。

最后，深化文化实践活动，强化情感体验与认同。举办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节庆活动，让受众在参与和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与情感力量。在学校、社区、博物馆等场所开展文化教育项目，通过讲座、展览、工作坊等形式普及中华文化知识，增强受众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鼓励他们参与文化创作与实践，通过亲身参与深化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体验。同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创造出更多具有民族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满足人们对中华文化的多元化需求，丰富他们的物质生活，强化对中华文化的情感体验与认同。

五、结语

文化主体性视域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不仅是民族历史记忆与当代精神的视觉化传承，更是文化自信与国际交流的重要载体。挖掘传统文化精髓，融合现代设计语言，构建一个兼具深厚文化底蕴且富有时代感的叙事框架，强调文化主体性的核心价值，促进民族身份在全球语

境下的自我表达与认同构建。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全球文化的深度融合，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叙事体系将更加注重创新性与包容性的统一，持续拓展叙事边界，以更加多元、开放的姿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普遍价值，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增进国际理解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5-46.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1).
- [3] 马瑞雪, 李建军.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内涵、特征与衡量尺度[J]. 江汉论坛, 2024(5): 106.
- [4] 孟凡行.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 周边概念考释与核心概念建构[J]. 贵州社会科学, 2023(10): 27.
- [5] 杨红, 赖再博.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在当代社会生活场景中的传播与应用[J]. 当代美术家, 2023(2): 8.
- [6][15] 邓启耀.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形成与文化认同[J]. 民族艺术, 2021(6): 19、16.
- [7] 孟凡行. 乡村振兴: 民族视觉形象重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83.
- [8] 王建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下的文化符号与视觉形象[J]. 民族艺术, 2021(6): 29.
- [9] 双传学, 梁敬国.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逻辑溯源、系统呈现与价值旨归[J]. 江海学刊, 2024(3): 5.
- [10] 刘同舫. “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1): 5.
- [11] 杨文圣, 蔺雨.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四维意蕴[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1): 39.
- [12] 田鹏颖. 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叙事逻辑[J]. 学术交流, 2024(2): 5.

- [13] 张晶, 李晓彩. “中国故事”本土化与国际化叙事的张力——兼论中国电影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171-180.
- [14] 沈骑, 孙雨.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内涵、特点与结构框架——基于国际传播视域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 85.
- [16] 陈久金. 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与四象概念的形成 [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2(1): 9.
- [17] 段炼. 视觉叙事的结构与话语 [J]. 美术观察, 2011(8): 124.
- [18] 罗兰. 符号·叙事·话语: 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识性概念的文化之维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4(4): 22.
- [19] 钟艳. 以中华文化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6): 75.
- [20] 罗兰. 认知·态度·行为: 文化构筑民族话语权的三个维度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6): 20.

责任编辑: 徐晓婷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总体性建构

——基于大历史观的分析视域

王 东

摘 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之道,历史视野构成了观察和分析统一战线及其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视角。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建构,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需要秉持大历史观,深入探讨这一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文化实践资源。在此基础上,从价值内化、知识阐释、表达类型和传播方式四个层面整体把握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团结联合目标、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政治的主题、立足统一战线发展新任务新要求新实践等方面建构与完善话语体系。

关键词:大历史观;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总体性建构;知识阐释;表达类型;传播方式

统一战线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之道,其百余年发展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愈来愈成为打破西方民主与政治话语霸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面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至关重要,需要以更加系统、更加完善的话语讲清楚统一战线作为政治联盟的根本属性,讲清楚统一战线作为政治运行载体的独特优势,讲清楚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内在构成。正因如此,亟须秉持大历史观,以贯通过去、现在和

将来的整体性视野来把握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文化资源、内在结构层次和优化完善路径等核心问题。关于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由此,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建构,一方面需要以大历史观来分析百年历史进程中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演变规律和宝贵资源;另一方面也要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以更加宏阔的全球视野向世界讲好新时代中国的统一战

收稿日期:2024-12-01

作者简介:王东,南京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与意识形态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的生成逻辑及践行路径研究”(23CKS02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多重逻辑与践行机制研究”(2024SJSZ0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线故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为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创造和平环境。

一、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文化实践资源

统一战线及其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其熔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全过程的重大历史活动中，运用在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特征与满足实践需要中。历史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对于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而言，需要秉持大历史观来正确把握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历史方位，以总体性的建构串联起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守正创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新时代统一战线丰富的实践经验，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提供坚实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百余年历史资源

党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创造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展史。可以说，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频共振，构成了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内容，成为新时代建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自身的团结统一和争取同盟军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前提，是无产阶级运动需要加以贯彻落实的基本策略。因此，马克思主张工人阶级政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2]。无产阶级要进行的革命在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单独依靠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就使得根据形势变化争取同盟军、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成为实践所需。列宁继承并根据时代特征和革命实践的变化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使得“阶

级统一战线”发展成“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被压迫民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应当吸收代表其他劳动阶级或者阶层利益的政党加入政权，让他们共同参与革命政权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至此，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及范围虽然发生了新变化，但其作为革命策略的基本属性依旧没有改变。

统一战线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尤其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统一战线理论，强调党不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先锋队。这一重大论断既是对中国共产党角色的新确认，即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共产党国际中国支部”转变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主体性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体性；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的重大创新，即以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征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以鲜明的民族内涵与时代要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开启了协商建国的历史进程，并推动新中国的国家制度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走向人民民主专政，统一战线深度嵌入国家政权体系之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中，统一战线的内涵及其话语表达进一步突破了苏联式话语的束缚。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更加艰巨复杂，统一战线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由原初语境中的“革命策略”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之道”。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从底线思维来认识统一战线工作，以问题为导向来防范化解民族宗教、港澳台海外等领域的风险挑战，在内政外交国防等各领域都体现了统一战线的治理之智。

经过百余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统一战

线从欧洲革命话语逐步扎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之中，其作为阶级联盟的内涵不断扩展与丰富，发展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更具包容性的认同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述到深刻彰显中国特色，统一战线作为革命策略的基本定位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最终实现了“由术及道”的突破性发展。从散见于经典作家论述中到形成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得到了极大创新。正因如此，提炼具有标识性的统一战线概念、命题和原理具备了理论根基，为总体性建构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第二个结合”中文明赓续创新的深厚文化资源

从话语资源走向话语体系，离不开文化层面的提炼、阐释与表达，如此才能把统一战线的丰富内涵以人民认同且易于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换为具有共识性的统一战线话语，才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成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最为丰富的资源宝库。因此，总体性建构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需要做到“两个结合”，特别是以“第二个结合”融会贯通魂脉和根脉，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思想史角度加以把握。

一方面，中华文明蕴含着统一战线的文化基因和政治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强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1]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之中，最显著的文化标识、最强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大一统，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得以再次大一统的核心领导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大一统的法宝之一便是统一战线。这三者之间环环相扣，充分说明了统一战线理念与大一统具有天然联系，不仅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

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政治底线，也深刻影响到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主体的根本追求，即确保中华民族与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另一方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与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不仅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融入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更是在统一战线相关的制度设计及体系建构中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例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华传统政治伦理之间的结合，彰显了和合文化影响下多种政治力量协商共治、维护大一统政治格局的优良传统，对于形成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的和谐政党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又如，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等，共同构成了统一战线画出最大同心圆的思想文化基础。

（三）新时代推进“两个共同体”建设的丰富实践资源

新时代以来，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与践行为建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两个共同体”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其本质是要建立起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高度整合的有机体，并逐步延展到国际社会，形成全人类共同解放与自由的联合体。共同体的形成是以更加自觉的共同体意识为基础，以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团结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凝聚人心的文化共同体等为依托，这与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是高度契合的。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统一战线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愈发展现出促进共识性、鲜明多样性、广泛代表性和显著社会性等特点，能够成为构建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因此，统一战线与“两个共同体”很大程度上具有互构性。具体来看，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为

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提供了话语资源。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言，“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阐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等，都蕴含着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围绕如何凝聚人心、如何凝聚共识，从历史与民族等维度拓展了统一战线的话语内涵。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尽管它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分属不同的领域，但从统一战线融入治国理政的视角来分析，两者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并且以统一战线贯通“两个共同体”的过程就是统一战线话语宣介、话语创新的过程。“两个共同体”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对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环境中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反思，两者并行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创造源源不断的新资源。

二、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层次结构

大历史观强调对历史活动的考察应该深入其内部，从整体性的角度来把握其发展进程以及内在结构，进而形成关于这一历史活动的客观全面的认识与理解。就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这一历史活动来看，话语体系是掌握话语权、提升话语能力的关键支撑。主动建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是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建设的重要体现。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可以分为价值内化层面、知识阐释层面、表达类型层面和传播方式层面，具有稳定性、开放性和规范性等基本特点。

（一）价值内化层面：紧密围绕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主题

价值内化是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内核与根基，不仅决定了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方向和理念遵循，也直接影响到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成效和战略策略。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凸显。在此背景下，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既是为统一战线工作服务，也是聚焦党的中心任务而进行建构。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其目的在于为党的事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这构成了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核心主题。

一是更加注重增进“共同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4]。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要不断增进共识，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例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重大原创性的话语论断和实践举措，深刻彰显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二是更加注重提升“相通性”。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统一战线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以话语相通达到情感相通、心灵相通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特点，通过提供更丰富的共情共鸣的话语表达来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和宣传舆论工作，不断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三是更加注重强化“统合性”。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领导，一系列重大顶层设计和改革举措在实践中将统合理念融入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价值遵循之中，使得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建构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概言之，“同”“通”“统”三大价值理念内化于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对强化大团结大联合具有重要价值。

（二）知识阐释层面：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

知识阐释是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重要支撑，以创新的理论知识深度总结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

的发展规律，为话语体系的全面建构提供系统化的学理依据。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知识阐释层面最大的成果是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就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任务、方针原则、基本要求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这一重要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文明为根，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战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其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最重要理论成果的同时，也为建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注入了强劲动力。

一方面，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统一战线工作不仅要重视力量对比，更要强调人心向背的重要意义。只有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原则立场，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党的特殊群众工作才能更好发挥出服务中心工作、推进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从凝聚共识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统一战线工作要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共识来画出最大同心圆，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从居安思危的角度来看，面对民族宗教、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领域存在的风险挑战，统一战线工作必须有所作为，以问题为导向走深走实。上述丰富实践为统一战线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通过原创性的概念、话语等，正在逐步形成关于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新研究范式和更加成熟化体系化的自主知识。例如，在正确处理政党关系方面，提出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在正确处理宗教关系方面，强调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在正确处理阶层关系方面，高度重视党外知

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相关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在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方面，提出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在正确处理海内外同胞关系方面，提出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等等。这些方面的话语创新蕴含着深刻的理论知识，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为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理论给养和学理支撑。

（三）表达类型层面：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和对外话语的有效结合

表达类型是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具体展现。结合相关领域的实践需要所进行的专门性话语设置与阐述，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丰富样态。话语类型从指向的时空范围来看，一般可以划分为对内话语和对外话语。其中，对内话语就呈现方式而言，大致可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新时代以来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正在努力贯通对内话语和对外话语，以形成强大的话语集聚效应。

政治话语在统一战线话语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学术话语、政策话语以及对外话语都具有引领性。党关于统一战线重大意义、原则目标、建设方向等有关话语论述，是政治话语最核心的内容，对事关统一战线及其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为后续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但政治话语要真正深入人心，需要学术话语的建构与支撑，才能不断提升解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因此，可以说学术话语在整个统一战线话语体系中处于中间层次，既对政治话语进行学理分析和阐释，也为其他各类话语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引。新时代以来，相关领域不断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学理化研究，在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统一战线工作具体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努力打造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在阐释好统一战线工作鲜明特质的基础上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统战之智。政策话语更加注重实践导向，也

密切结合统一战线相关领域进行话语创新。很明显的一个转变就是统战话语转向话语统战，话语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对外话语是新时代以来建构话语体系的重要方面。一般而言，对外话语是一个国家以话语实践活动的形式向世界进行自我展现，是其他国家了解本国相关领域发展的重要载体。统一战线工作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伟大事业，本身蕴含着强烈的对外话语宣传需求。新时代以来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是推进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手段。通过坚持开放原则，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让更多的国家了解统一战线的中国特色及世界意义。

（四）传播方式层面：分众化精准化的话语呈现与内涵式发展

传播方式是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实践手段。进入新时代，话语宣传的传播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话语传播面临着深度转型与调整。面对传播领域的深刻变化，需要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传播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这对于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尤为重要。可以说，随着传播智能化、数据化发展加快，有效进行话语传播的重要性不亚于话语知识生产。换言之，话语内容既要有理，更要有入听、有人信。正因如此，统一战线话语建构也越来越重视技术性因素，在传播方式上更加强调整分众化、精准化，不断创新方法手段、丰富产品形态，逐步形成多要素、全媒体的传播矩阵，从而让话语声音能够传播出去。此外，在对外传播中，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的心理世界，尽最大可能打造具有共同价值认知的话语概念，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多元共存、交融发展的特征，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蕴含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思维智慧，正是统一战线话

语的重要体现，这对于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的完善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5]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进程中，我们既面临着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复杂多变的挑战，也面临着改革发展稳定的重任、矛盾风险挑战继续增加的现实和多元文化思想交流交融交锋的局面。这亟须以大历史观为指引，通过构建和完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来增进思想认同和政治认同，把统一战线的话语资源、重要概念、原创性命题和论断转化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理念新方法新制度，由此将统一战线的话语体系建设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支撑。

一是坚持党对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话语体系。百余年来统一战线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历史经验就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最根本、最关键所在。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首先体现在要充分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成为时代先锋、民族先锋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要把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等内在联系讲清楚。在此基础上，要把话语体系建设与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紧密结合起来，将党的政治目标转化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共识，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话语旗帜，让党的领导在润物细无声之中团结一切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是聚焦凝心聚力的目标，不断完善话语体系。从历史来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内部社会阶层结构极为复杂、社会变迁更加剧烈，越是接近民族伟大复兴，就越是充满了更加艰巨复杂的挑战，越是需要凝聚更加广

泛的人心、激发更加蓬勃的力量。因此，在建构和完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过程中，要面向全体中华儿女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故事，不断强化港澳台同胞的国家认同与心灵相通，继续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融通，用更具共同性的话语来增进海外华人华侨的理解与支持。除此之外，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必须做到与时俱进，特别是要充分关切统一战线各群体的利益需要，如民主党派人士、非公经济从业人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宗教信众等，不断以共同话语来提升共识，让各群体在统一战线中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三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主题，不断完善话语体系。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内在追求。在很大程度上，统一战线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建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结合起来，明确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大法宝作用，深化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要继续扎根中华文化的历史土壤，在挖掘丰富资源中创新时代内涵，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增强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这三大历史活动的同向演进中发挥统一战线的话语作用。

四是立足统一战线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新挑战，不断完善话语体系。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用以巩固共同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的功能越来越重要。在不同领域都需要根据实践新情况进行话语创新与阐释。针对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新实践，统一战线话语体系要阐释好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呈现好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体制内与体制外等方面的良性互动，宣传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优势。针对社会治理的全新要求，统一战线话语体系要聚焦团结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用灵活的语言紧扣不同阶层人士的话语需要，通过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逐步搭建起沟通联系的渠道，更加主动地用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等带有共识性的话语凝聚力量。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统一战线话语体系要聚焦讲好讲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全方位加强和改进民族领域的话语宣传，围绕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写好话语创新的新文章，围绕“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等核心话语做好阐释，在全社会范围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针对宗教领域的新形势，统一战线话语体系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善于用中华文化浸润宗教、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教义阐释，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实现宗教事务治理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11、13.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2.
- [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24-09-28(2).
- [5]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58.

责任编辑：吉强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适应性的三重逻辑

龙雪岗 金文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战线始终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能够适时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工作对象、功能定位及组织形式作出适应性调整。这使其既能适应革命环境下壮大革命力量以服务于敌我斗争的需要,又能适应执政情境下整合多元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的现实性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适应性优化被融入制度化、组织化建设的进程中,确保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因此,不断增强统一战线的适应性是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适应性;国家治理;组织形式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深入分析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建设的历史篇章。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坚持统一战线”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

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3]的重要作用。对此,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总结的是,百余年来统一战线何以始终成为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其内含的结构韧性何在?本文试从“结构—功能”视角出发,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为牵引,重点考察百余年来统一战线在工作对象、功能定位以及组织形式的历史演进,以揭示统一战线适应性的内在逻辑。

收稿日期:2024-09-06

作者简介:龙雪岗,中共江苏省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纪检制度与党内法规;金文,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准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协制度研究”(22FDJB004)、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中国统一战线学科建设路径研究”(ZK01202401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统战工作对象厘定标准的调适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政党是代表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政党联合(统一战线)的本质是不同阶级间的联盟,目的在于凝聚各种革命力量以对付共同敌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开展统一战线是为了促使“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同时共产党人又需保留“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4]。1920年7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一文中指出,“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5],统一战线思想成为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提供了指导和支持,故有学者认为马林“应该在中共一大上介绍了”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以及“统一战线原则”^[6]。由此可见,通过统一战线凝聚革命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阐述了建党初期的统一战线主张,强调“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7]。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统一战线思想的基本内涵:其一,政党联合的本质是阶级联盟,是统一战线的直接表现形式;其二,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目的在于壮大革命力量以服务于敌我斗争。因此,阶级身份、党派身份成为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厘定统战工作对象、区分敌我边界的标准。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既是国共统一战线的成果,也是维系国共统一战

线的政治基础。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破裂。随着国民党在形式上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其政治、军事优势挤压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空间,致使国共两党从政治分歧演变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敌我军事对立。由于城市中反革命力量相对集中,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从而走上自主开创工农统一战线、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为大革命失败后壮大革命力量的策略性选择,工农统一战线起初带有明显的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工农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时强调:“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瑞金时代是纯洁、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8]在毛泽东看来,统一战线作为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法宝,其要义不在于求得内部结构的单一化,厘定统战工作对象的标准不能太拘泥于阶级身份的限制,而是在多元中寻得统一,在统一中凝聚力量。

“七七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则成为次要矛盾。在“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立即提出,要构筑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及“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阶级身份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以及除汉奸、投降派以外的地主家阶级和亲英美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广泛联盟”^[9]。这意味着厘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界的标准不再拘泥于阶级身份,而是更加强调“政治态度”,其目的在于将所有支持抗日救国的爱国者及爱国组织纳入统一战线范畴,以壮大革命力量。统战工作对象厘定标准的变化,不仅使得统一战线拥有了极大的政治弹性,可以团结一切抗日救国力量来推进民族解放事业的发

展,还使得统一战线被赋予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核。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为避免内战爆发并保障各阶级、各党派在政治上共同发挥作用的权力,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10]。新民主主义国家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11]由此可见,此时的统战工作对象不仅包括特定“阶级身份”和“政治态度”所厘定的有关群体,还涵盖了“统一战线民主联盟国家”政治制度施效范围内的所有人民,统战工作对象范围空前扩大,统一战线也被赋予分配国家权力、保障民主权利等政治功能。

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建立“统一战线民主联盟国家”的政治主张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被重新提出。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集聚起来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内部结构呈现出“多元统一”的基本特点。其中,“多元”指的是统战工作对象的多元,具体可由三类划分标准来加以区分:一是就阶级身份而言,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二是就政治态度而言,不仅包括对“共同纲领”持肯定态度的中左、中间、中右三个部分“中间力量”,还包括国内外所有爱国分子;三是就“制度+地域”层面而言,不仅包括地理意义上新中国政治制度施效范围内的各族人民,还包括“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国家”^[12]。相较于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一战

线已进一步拓展至国际关系层面,统一战线的政治和思想基础也更加聚焦,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及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对厘定统战工作对象的标准进行了调适。此时,统一战线不仅是阶级联盟、党派联盟,还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其中,爱国者联盟涵盖的范围最为广泛,例如,“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回归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13]。由此可见,“爱国者联盟”是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层面出发,比“劳动者联盟”更为宽广的概念。此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丰富了“爱国者”的内涵,强调“统一战线已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14]。这赋予了“爱国者”拥护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双重内涵,使得“爱国者”所能涵盖的范围可以超越地理空间、社会制度、国籍身份等所建构的界限。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团结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目标完全契合”^[15],并进一步将“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16]纳入统一战线工作范围,这不仅丰富了“爱国者”的内涵,更拓宽了统战工作对象范畴。

纵观百余年来统战工作对象厘定标准的变迁历程,其要点主要有:一是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阶段,统战工作对象的厘定标准从阶级身份主导转变为阶级身份与政治态度并存,以便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号召下构筑全民族抗战的政治联合;二是在民主建政过程中,统战工作对象的厘定标准除了包括阶级身份、党派身份外,还涵盖地理意义上社会主义制度施效范围内的所有人民;三是改革开放后,统战工

作对象的厘定标准既延续了此前多元化的标准，又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两面旗帜下，实现了对特定政治态度、“制度+地域”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融合。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能顺时应势地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具体目标任务的变换，及时就统战工作对象作出必要调适，使其既能适应革命战争环境下壮大革命力量以服务于敌我斗争的需要，又能实现在执政环境下对多元社会的常态化政治整合。

二、统一战线功能定位的跃升

统一战线在百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其功能定位经历了从策略向战略的跃升，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反映的是手段、方式层面的问题，后者强调的是目的、价值层面的问题。建党初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且一盘散沙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缺乏权威性权力主体，更缺少规模庞大的工业无产阶级作为引领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背景，也是推进统一战线实践从策略层面向战略层面跃升的结构性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17]，且“不同统治阶级的国家，其性质是不一样的，从而产生不同类型的国家，即国体”^[18]。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其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9]。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催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工业发达且无产阶级众多的西欧国家率先发起。然而，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并未在工业基础发达的西欧国家掀起，反而在工业基础薄弱的俄国率先取得成功。列宁对此作出了理论性补充，强调后发国家在通向“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必须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还“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

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还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20]。在列宁看来，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是特定历史阶段下，无产阶级为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到来、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手段和策略性选择。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的统一战线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实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创造性发展。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主张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以此展现新情势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21]。1938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统一战线功能的战略定位问题，强调全面抗战时期的革命就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参加这个民主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抗日的力量，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阶层和党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现在革命阶段上实行了一个战略的改变”^[22]。

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从“策略性”向“战略性”跃升具有双重意涵，一是统一战线所蕴含的阶级联盟不仅仅是各革命阶级间的联合以壮大革命力量的手段，还是革命环境下国家性质、结构的具象化表达；二是统一战线所构筑的“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概念不仅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还兼顾了阶级立场，解决了“中国社会阶层或阶级在革命年代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同盟者的理论难题，并解决了‘人民’概念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的统一问题”^[23]。这一概念以其超越阶级的特有属性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阶级联盟特性所耦合。因此，在理论层面，统一战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国体理论构建的承载形式。

毛泽东认为，国体“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

的地位”，并将国体分为资产阶级专政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共和国及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共和国三种，其中“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由于产业工人的规模小、力量弱，加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决定了单一革命阶级无法承担起民族独立与国家构建的双重使命，必须通过统一战线以谋求不同阶级、党派的联合。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情境下的统一战线所承载的必然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同时因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可移易”而具有了战略层面的意涵。

从现实来看，尽管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未能运用于实践，但在解放战争胜利后，这一政治主张在优化改进后得到了坚决落实。从1948年“五一口号”的发布至1949年9月，统一战线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完成“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5]联合专政的政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同时“三大改造”的完成使得原有剥削阶级赖以支撑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被消灭，政协的职能和存续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对此，周恩来强调：“人大既开，政协代行人大职权的政权机关作用已经失去，但政协本身的统一战线的作用仍然存在，去掉一个代行的作用，留下本身的作用。”^[26]这意味着统一战线不再作为国体的承载形式，而是专注于“党派性”联盟，其职能是借助人民政协的组织形式对国际问题、候选人名单进行常态化协商，同时履行提意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协调各民族、各党派、人民团体与民主人士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等具体职能。可见，自全国人大产生后，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功能定位得到了全新阐述，并在社会主义时期得到全新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在这一背景下，统一战线的职能定位除了阶级联盟、政党合作外，还需发挥凝聚社会、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以此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统一。为进一步保障统一战线职能的实现，1989年底，中共中央制定和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即人民政协纳入这一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的功能定位进一步丰富，尤其注重在推动“大团结大联合”过程中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27]，具体包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28]，以此汇聚成推进民族复兴的磅礴之力。此外，统一战线还凭借其“治理主体广泛、多样，价值的包容性，组织平台的宽广性等优势”^[29]，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托。

纵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百余年历程，统一战线的功能定位大体经历两次重大跃升，一是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战线从革命战争情境下壮大革命力量的手段，转变为执政（包括局部执政）环境下国体的承载形式，以实现国家公权力的民主化配置；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既坚持了阶级联盟、政党合作的功能定位，又在多元经济社会环境下发挥着凝聚社会和国家政治力量的重要作用。从历史发展进程分析，统一战线功能定位的调整及战略跃升，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具体形势的变化，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具有明显的协同性，这也是统一战线展现出强大适应性

的重要逻辑依据。

三、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设计与优化

随着统一战线的功能定位从壮大革命力量的策略跃升为国家治理的战略，这不仅意味着统一战线承担推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还意味着它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培育并规范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运作。在革命、建设及改革的百余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先后设计出“三三制”、联合政府以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种特点鲜明且能不断适应历史发展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

（一）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权实践——“三三制”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进一步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策略路线”，用以“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30]；“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果，同意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同时强调要“在特区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31]。由此可见，从“苏维埃政府”到“特区政府”不仅是名称上的变换，还反映了政权组织、民主形式上的结构性重塑。

中国共产党为在陕甘宁边区“施行普选的民主制度”，于1937年下半年组织选举边区政府的各级议会。这一方面极大拓展了边区的民主生活，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党专制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话语权；另一方面，在初期的选举过程中，出现了诸如中共“党员当选的比例过大”“‘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掌权”，以及少数地区“基层权力被豪绅地主所把持”等非正常现象^[32]。对此，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就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原则进行了补充，强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33]。

此时，“三三制”概念虽未正式提出，但其内涵也已相当明确。在实践中，“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在政府人员配置和民意机关中得到充分落实。

“三三制”作为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主政权的有益探索，其核心在于通过“将自由主义追求的个体权利平等转化为革命政党追求的党派与阶级平等”^[34]，这既实现了对革命力量的有效整合，又回应了革命环境下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各党派、阶级的民主诉求。因此，“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既是一种民主实践形式，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积极尝试，更开启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历史先河。

（二）抗战胜利后的民主政权主张——联合政府

随着抗日战争逐渐进入尾声，民众对国家政权统一的美好期许与国共两党二元分治的现实成为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难题。具体而言，统一的国家政权必须能够同时容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等政治力量，而这远非“三三制”政权所能实现。

针对构建统一政权的现实诉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从国体层面而言，“联合政府”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从政体层面而言，“联合政府”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35]。可见，“联合政府”的主张意在构建“允许其生存发展和在政治上共同发挥作用”^[36]的国家权力结构，借此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及民主转型。就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言，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就让蒋介石当局陷入极大的政治被动，即“如果接受这一主张，意味着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他本人也无法实行个人独裁”；如果“拒绝联合政府主张，又违背国人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政治的民意，将原本持中间立场的包括民盟在内的第三方面力量置于自己的对立面，

为中国共产党制造出可靠的同盟军”^[37]。历史表明，重庆谈判一定意义上只是国民党为应付民意、争取备战时间的政治阴谋。

联合政府主张虽然只是一种理论构建，但统一战线从“三三制”的“革命阶级的联盟”发展到“联合政府”的“民主阶级的联盟”，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尝试以政治谈判的方式改组国民政府，借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此举虽未成功，却赢得了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的广泛认同，为此后开展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标志着中国政治的主题由“战时”转移到“战后”^[38]，统一战线所覆盖的空间区域也从边区扩展到全国，统一战线的民主价值也因“联合政府”主张而变得更加深刻。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仅包括了各党派、各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还设立了区域代表、职业或团体代表和聘请代表等。因此，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初始预设的小规模、精英化、由党派及团体代表组成的临时性的机构最终变成了大规模、人民化、由党派、团体和区域代表组成的常设机构”^[39]，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成为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权力机关，顺利完成了“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人民政协所蕴含的民主价值不仅包括革命情境下以党派、阶级为主的群体性平等，还包含了现代民主价值中的个体、区域及民族平等。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但其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仍将被用以维系及巩固“党派性”联盟。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政党的存续以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统一战线作为“党派性”联盟，其战略地位的存续也是以中国共产党及阶级的存

在为前提，因此，“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是我们党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方针”^[40]。从人民政协内部组成来看，它主要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及各界别代表构成。在中国现有政治框架中，由于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数量是固定的，这就使得设置条件较为灵活的界别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两个要素成为提升统一战线适应性的重要依据，其中在界别设置上表现尤为明显。

人民政协凭借其特有的构成而成为“缓解现代社会成长与民主政治发展之间的张力的协调机制，以避免国家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之间的断裂”^[41]。在具体举措上，人民政协不断提升其在多元社会中的政治整合能力。

一是优化界别设置，不断提升政协代表性。通过梳理1978年至2023年间的十届全国政协的界别数量和委员人数情况（见表1），可以发现人民政协提升代表性、优化界别设置的举措有以下几点。其一，政协委员规模的灵活性为人民政协更好整合多元社会预留了一定的弹性空间，且在1978年至2023年期间，政协委员人数呈现出持续增加的趋势；其二，全国政协界别设置的绝对数量在1978年至1993年间从29个增至34个；其三，自1993年八届全国政协至2023年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其界别数量虽因“增—减”持平而不变，但并不意味着界别设置的类型及其代表性也维持不变，如2023年十四届全国政协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两个界别合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一个界别，并新增了“环境资源界”这一界别；其四，调整界别名称。如六届全国政协将此前的“农村界”修改为“农林界”，九届政协进一步修改成“农业界”，扩大了同一界别的范围。在优化界别设置、提升政协代表性过程中，人民政协极大保障了新兴阶层“作为单独群体参与国家决策的能力”^[42]，进而提升人民政协对多元社会的整合能力。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全国政协界别数量和委员人数情况

时间	召开届名	界别数 (个)	全国委员会 人数(个)
1978年	五届全国政协	29	1988
1983年	六届全国政协	31	2039
1988年	七届全国政协	32	2081
1993年	八届全国政协	34	2093
1998年	九届全国政协	34	2196
2003年	十届全国政协	34	2238
2008年	十一届全国政协	34	2237
2013年	十二届全国政协	34	2237
2018年	十三届全国政协	34	2158
2023年	十四届全国政协	34	2172

二是提升人民政协的制度化 and 组织化程度。在制度化建设上,改革开放以来曾先后 7 次修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有关人民政协的规范性文件。在提升人民政协组织化、制度化运作上,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以及建立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等具体措施,其目的在于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不断提升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组织化程度。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还重点完善了各级人民政协“年度协商计划”制度,并突出强调各级党委不仅是同级政协“年度协商计划”议题的提出者、制定者,还是“年度协商计划”的审核者、实施者和监督者。这不仅有效提升了各级人民政协工作的组织化程度,还强化了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

概而言之,统一战线通过对人民政协组织形

式的调整,有效整合了多元社会,成为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运作的重要抓手,也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
- [2][2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0、70.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4][1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4、41.
-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G].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17.
- [6] 肖存良.中共一大与统一战线关系再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21(5):107.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8.
-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635.
- [9] 蔡宇宏,李俊.论统一战线主题内容的发展演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5):91.
- [10][3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6、1057.
- [1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13.
- [12] 徐辰.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中国近代宪法文献选编(1840-1949):下卷[G].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443.
- [13][4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09: 356、493.
- [14]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411-412.
- [15] 钱再见, 史诗悦. 共识与团结: 统一战线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2): 33.
- [16]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1: 5.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3.
- [18] 王沪宁.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92.
- [20] 列宁全集: 第十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95.
- [21]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8.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五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84.
- [23] 侯竹青.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构建与意义形塑(1921—1949)[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81.
- [24][33]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75-676、742.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六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07.
- [26] 全国政协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205.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56.
- [29] 李俊. 统一战线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逻辑及其优势[J]. 社会主义研究, 2021(5): 118.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二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36.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四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8.
- [32] 陈先初.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J]. 抗日战争研究, 2002(1): 145.
- [34] 王建华. 改造民主: 抗战时期“三三制”选举的革命面像[J]. 南京社会科学, 2010(9): 124.
- [36] 杨奎松.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J]. 近代史研究, 2006(2): 1.
- [37] 罗平汉. 从联合政府主张看中国共产党斗争艺术的成熟[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0(5): 20.
- [38] 邓野. 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5): 202.
- [39] 赖静萍, 闫小波. 接续抑或更张: 从“新政协”到“人民政协”[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2): 21.
- [41] 袁峰. 中国形态协商民主的成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学分析[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6: 179.
- [42] 高秉雄, 张江涛. 人民政协界别: 变迁与改革[J]. 社会主义研究, 2009(6): 63.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以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与路

付 瑀 邹丽芬

摘 要:以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民主、团结、和谐为价值遵循,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发展方向,共同构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在长期实践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凝聚了强大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供给了秩序保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创生出诸多发展成果与现实价值。展望未来,进一步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要在制度主体、制度体系与制度信任这三个层面同向发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 制度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 理与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1]。由是观之,制度建设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具有利益代表广泛、奋斗目标一致、决策施策科学、国家治理有效的显著优势。制度建设有利于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制度效能,实现

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当前,学界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综合讨论的研究较少。对此,本文通过明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核心概念与主要内容,进而分析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以期形成整体认识。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核心概念与主要内容

(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核心概念
制度建设是制度主体依据政治发展形势,通

收稿日期:2024-09-30

作者简介:付瑀,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邹丽芬,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研究”(21ZDA12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优创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研究”(2024CXZZ1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过合理的建设方法与有效的制度安排推动制度体系与机制不断完善，最终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意味着制度建设的目标、过程与方法都要契合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比如民主、法治、科学等。因此，现代化意义上的制度建设是指制度主体以民主程序为支撑，经过科学研判，优化各项制度内容，做到稳固制度架构、厘清制度边界、规范主体行为、调整主体关系，最终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过程。“制度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2]，有效的制度建设可以为现代化的高效推进与行稳致远提供坚实保障。

实践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与长治久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支撑。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应当不断完善与发展，通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前进动力与更为坚强的制度保障。基于现代化意义上的制度建设概念以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在长期实践中，通过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含的民主程序，经协商讨论与科学决策，做到制定政策规范、完善组织结构、拓展参与渠道、创新运行机制，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各项体制机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通过提供强大制度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活力与动力，以有效的制度供给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态过程。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个国家的公共制度包括基础制度（宪法体制）、基本制度（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制度（政策规章）^[3]。对国家公共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构成了制度建设的全部内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应制度建设内容中的“基本制度”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内

容与国家制度建设内容在逻辑上是相契合的。

其一，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宪法保障。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入宪”，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入宪”是其制度建设在宪法保障层面的核心成就，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鲜明体现，从此“中国各政党之间不仅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有了相互的理解和信任，还有了处理党际关系的法理依据，使这种政党关系更加稳固”^[4]。

其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体制机制进行完善与创新。在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通力合作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制度以及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参政党建设、民主监督、政治教育等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关的体制机制进行完善与创新，例如，创新建立双周协商座谈会机制、专题协商机制等；再如，各地方部门纷纷创新参与渠道，如湖北省政协搭建的“协商在一处”平台等，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结构不断完善，民主参与渠道丰富畅通。

其三，制定相关文件政策支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中共中央根据客观发展需要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要求，颁发实施了若干中央文件与党内法规，如《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意见》《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这些文件与法规从政党制度建设、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现代化、统一战线等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领域构筑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框架，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发挥提供有效政策支持。

二、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

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种制度发展模式的简单运用，其逻辑生成要立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各制度主体本身，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为基础，科学分析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

（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

在人类社会，有社会共同体就有合作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领导关系。合作需要领导，但合作是否长效关键在于由谁来领导。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谁来领导”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权威合理化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5]。在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为开启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无可争议的权威主体与领导核心”^[6]。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种领导建立在党际关系平等以及充分尊重民主党派组织独立的基础上，并且在实践中寓于同各民主党派的民主协商之中。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and 搭建平台，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现代化建设，通过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共同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水平与制度效能不断提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贡献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意见》站在政党制度建设的高度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7]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高度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8]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二）以民主、团结、和谐为价值遵循

价值的作用在于为政治提供规范，在引导各种政治活动的同时通过所提供的政治理念形塑政治活动，推动政治向善向好的方向发展，没有价值支撑的政治实践是不能长久运行的。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有相应价值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9]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核心和国家政治制度支柱的政党制度具备行之有效的民主功能，以期更好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10]。纵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演进历程，其创立和发展始终以民主为价值内核，在民主实现形式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有机结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目标亦是通过对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规范支持实现人民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与全覆盖，最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与此同时，在以民主为价值遵循的政治实践中“要推动社会向着自由、平等、公正、文明、团结、和谐的方向前行”^[11]。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同心同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基于合作的团结与和谐关系。团结即政党团结，表现为各政党为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努力，不断夯实共同思想基础。对此，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12]和谐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不是相互倾轧的竞争关系，而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生共促的和谐政党关系。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体现广泛性与进步性相统一，并通过坚持“团结一批评—团结”的方针及时化解影响政党关系

和谐的因素。如是观之，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民主、团结、和谐为价值遵循的。

（三）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任务目标

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是制度建设中的关联系统，标志着一项制度步入确定性、稳定性与现代性的发展轨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13]。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1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亦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目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建设在于通过有效的体制供给厘清制度边界，确保制度权威；规范化建设在于通过建章立制供给行为准则，规范主体的具体实践行为；程序化建设在于供给运行机制，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决策程序，实现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确保民主政治实践的公正性。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供给有效的体制、机制与规范，有利于激发制度潜能、凝聚制度力量、积聚制度资源，对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来说极为重要。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15]。这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16]“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历史上出现的各种错误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对法治化的轻视，甚至是蔑视直接相关。”^[17]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最终发展方向是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这就需要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重要支撑，善于把法治精神、法治要求嵌入制度运行中，针对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制定相关党内法规，有效解决相关问题。

三、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党的基本方略，作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完善顶层设计，健全制度机制，巩固政治共识，激发制度效能，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更加成熟定型。”^[18]实践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系统完备、凝聚共识、和谐稳定、独具魅力的好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创生出诸多发展成果与现实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行稳致远与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重要制度力量。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凝聚了强大合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19]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有机系统，在推进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利益诉求、思想观念、生活条件不同的多元力量。从这些不同的力量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汇聚成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总合力，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的关键所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为这种“总合力”的形成提供制度化保障，有效凝聚同心力量，汇聚同行力量，最终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的力量。一方面，通过在多党合作中建立系统的政治协商、政治参与、民主监督等机制，使政治决策不仅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充分尊重不同社会阶层与界别的具体利益，从而整合了不同阶层的诉求与意愿。例如，在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治协商，并在会议上提交与中国式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提案与议案，这有利于将不同社会阶层的合理诉求纳入政治决策之中，通过利益整合凝聚起中国式现代

化整体推进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中共中央通过颁发实施相关重要文件与党内法规，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巩固社会基础。例如，2015年颁发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把“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与“新媒体从业人员”统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明确将之纳入统一战线，此后中共中央对相关工作作出进一步规范，中央统战部专门设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为相关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由此进一步凝聚了前进力量。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提供了秩序保障

虽然现代化最终会带来稳定，但其进程中却极易出现不稳定因素：当政治制度无法适应快速发展带来的参与诉求激增时，就可能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因此，协调好快速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是各国现代化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特征意味着其发展必然是极为快速的，同时“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0]。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21]这就对政治制度容纳度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度建设，以规范政治协商内容与拓展政治协商渠道为主要方法，有效提升了制度体系容纳度。一方面，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渠道程序，并提出七种政治协商渠道，其中政党协商居于首位。2022年《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政党协商与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是政治协商的两大基本方式，这就为各主体明确了参与渠道及其相关参与要求。另一方面，通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有效拓宽与创新了政治协商渠道，“其中政党协商与人民政协会议

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参与渠道拓展的两个宏观方面”^[22]。在微观层面有“双周协商座谈会”“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党外人士座谈会”等形式的拓展创新，通过扩充政治体系容纳度，为有关主体参与政治提供了多元且畅通的渠道。以政党协商为例，目前“政党协商基本形成了以相关法规为保障、以中共中央文件为主体、以配套机制为辅助的制度体系”^[23]，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供给了秩序保障。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要求各领域各方面必须高速前行，同时保质保量，实现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并行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4]汇集人才并使之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层面来说，人才主要指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这是因为他们涵盖了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与社会成员的方方面面，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和联系广泛的优势，在与中国共产党互进互促的过程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可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将人才汇集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体系范围之中。一方面，中共中央通过颁发实施相关重要文件与党内法规，明确规定了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性质、内容、形式与程序，并要求中共各级党委支持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这就为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发挥自身优势指明发展方向，规范履职要求，并提供政策保障。比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帮助民主党派解决机构、编制、经费、办公场所、干部交流和挂职锻炼等方面的问题”^[25]。这不仅为各民主党派的优势发挥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有效提升了中国新型政党

制度的人才吸引力。另一方面，通过拓宽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空间以及履职活动平台，有效激发了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制定《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引导支持各民主党派深化对参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有意识地将一些优秀人才留在党外，为民主党派组织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并不断加大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培养力度与使用力度，确保党外干部有权有职有责。当前，各民主党派成员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拥有积极的参政意愿，并运用过硬的专业技能以多种方式进行政治参与，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基层治理等涉及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领域积极献计出力、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四、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全面深化改革始终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共同努力，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世界政党政治新形态，其制度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必然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26]为此，可以在制度主体、制度体系与制度信任这三个层面同向发力，不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水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迈进。

（一）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体建设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主体，是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力量。进一步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水平的首要任务是加

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体建设。

首先，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领导力为主线，做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发展党内民主，不断提高党员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质量，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权威—民主—法治有机结合的党内运行体系、执行体系与保障体系，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其次，要加强参政党建设。各民主党派要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强化前瞻性思考和整体性谋划，结合自身特点进一步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领域积极献策建言，深入调查研究，进行有力监督；以贯彻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加快构建完善的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机制，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注重把“检视整改”贯穿始终，在理论学习、调查研究、建章立制的过程中进行自我革命，持续提升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水平。

最后，要加强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虽然参政党建设已形成相关文件与政策保障，但对于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及其履职能力建设的关注度还不够。可以结合客观发展情况制定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与履职能力建设的专门性文件，推动其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完善无党派人士的选拔培养机制，不断加强政治教育，广泛建立无党派人士工作室，使之切实做到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

（二）健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

制度体系既是制度静态的组成部分，也是动态运行的依托。目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程序化、规范化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在民主协商中的实际协商内容边界不明确等。进一步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水平的关键任务在于不断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可以从“推进制度创新”与“填补制度空白”两个方面完善中国新型政

党制度体系。

一方面,要结合客观发展情况制订有关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文件,将有益经验及时上升为政策,将执行效果好的政策及时上升为机制或创新性制度。在此基础上,要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构建集成有序、相互协调、联动贯通的机制集群或制度集群,再根据客观发展情况将之进行整合,最终形成运行高效与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例如,政党协商就经历了从“座谈”到“惯例”再到“传统”最终形成创新性制度的发展^[27],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其各项机制不断健全完善,为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提供了实践范例。

另一方面,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存在的不足,要及时补齐各项体制机制的短板,并通过改革实践丰富制度资源,服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与成长。以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为例,全国政协于2023年12月颁发实施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意见(试行)》,对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联系对象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与保障。在具体实践层面,根据其目前界别协商平台设置不够科学、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机制不够健全等不足,可以针对性地建立常态化协商议事制度、界别委员学习制度、界别委员联系群众激励机制等,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形成稳固的制度体系,做到填补制度空白。

(三) 塑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信任

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不仅要注重正式结构的完善,也要获得非正式结构的支持。制度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结构,有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和提高制度绩效,是提升制度建设水平的重要资源。进一步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水平的重要任务在于塑造制度信任并不断深化。

一方面,认知水平与制度信任度呈正相关,要通过定期的政治教育提升各主体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相关内容的政治认知水平。在政治教育

中,要推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因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政治文明新形态,涉及的领域广阔,需要将政党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制度伦理学等理论融入其中,以深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知,进而提升制度信任水平。与此同时,“以情促情”是深化制度信任的有效方式,在理论学习与政策学习中融入多党合作史上的光辉典型与现实政治中的生动实践,能够以情动人、以心化人,将情感带入政治教育之中。

另一方面,要不断积聚社会资本。塑造与深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信任的过程也是积聚社会资本的过程。普遍性互惠规范是社会资本的试金石,形成于主体之间的互动与交往^[28]。要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拓展各主体参与协商、治理与监督的渠道,并完善主体对话、交流恳谈、议题共谋等机制,为多元主体之间的和谐交往提供广阔空间与机制保障,形成普遍性互惠规范;相关政策应保障普遍性互惠规范的效力,奖励那些互惠互利的行为,惩罚损害集体利益的自私行为,以此克服“集体行动悖论”。与此同时,“健康完善的参与网络是现代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29]。要搭建横向的、以平等对话为基础的、主体享有充足自主性的民主协商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共建,决策成效及时反馈,协商渠道有机配合,形成健康完善的参与网络。

五、结语

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价值遵循为民主、团结、和谐,其发展方向是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这些共同构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在长期实践中,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生出诸多发展成果与现实价值,贡献了重要制度力量。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当前出现政党极端化的病症,表现为民粹主义泛滥、否决政治兴起、极右翼政

党支持率迅速增长等。从制度建设角度来说，其根源在于：西方国家主流政党的“政党组织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资源。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主流政党的草根性以及与社会力量的连接”^[30]，导致政党“卡特尔”化趋势明显，还有近些年兴起的公司型政党“则是以一种‘现代化’样态向‘权贵党’性质的回归”^[31]。这样一来，政党制度便沦为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无法有效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导致制度建设无法“对症下药”，不仅难以为现代化注入力量与活力，甚至出现反现代化的趋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贯彻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32]这就是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是任何团体或个人逐利的工具，而是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价值依归。以此为指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指向，在政治实践中充分尊重不同阶层和界别的具体利益，有效将多元利益诉求整合进制度体系，在政治过程层面实现了政党—国家—社会的动态平衡，制度得以稳定运行，社会得以充满活力，绩效得以迅速增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保障。

参考文献：

- [1][8][9][16][2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6、43、27、29、13.
- [2] 王浦劬.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擘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J]. 政治学研究，2024(4)：5.
- [3] 燕继荣. 现代国家治理与制度建设 [J]. 中国行政管理，2014(5)：61.
- [4] 中共中央统战部. 伟大的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22：182.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68.
- [6] 付瑀. 以政治权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四重逻辑 [J].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24(1)：74.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82.
- [10] 张师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阐释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6)：52.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国的民主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4.
- [12]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带给世界的启示 [N]. 人民日报，2018-03-10(3).
- [13] 钟德涛，付瑀.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5)：30.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25.
- [1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8.
- [17] 林尚立，赵宇峰. 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01.
- [18] 石泰峰.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J]. 求是，2024(17)：20.
- [19][21] 习近平.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J]. 求是，2023(19)：4、7.
- [2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4.
- [22] 钟德涛，付瑀.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 [J]. 思想理论战线，2024(1)：4.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2.
- [2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36.
- [26]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7] 李桂华，孟雅睿. 中国政党协商制度生成与发展：从“座

- 谈”到“制度”[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1): 31.
- [28] 周红云. 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5): 32.
- [29] 刘卫平. 社会协同治理: 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 22.
- [30] 曾森. 西欧政党衰败与民粹主义的崛起[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9-28(1).
- [31] 郭静. 政党的政治性分析: 西方政党类型学祛魅[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32.
- [32] 卢鹏, 臧秀玲.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契合互动[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3): 16.

责任编辑: 徐晓婷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再考察

赵立

摘要:作为革命家与思想家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挺进20世纪的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正是他探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在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实证主义演化出经验批判主义这一新形态,并打着科学的名义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面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走入的理论误区,列宁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的理论思考,深刻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的物质观、相对主义真理观与非历史立场,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思想成果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批判性与革命性,对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场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国式现代化

在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挺进20世纪的进程中,列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列宁不仅明确解答了俄国现代化发展之问,更是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其中,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中借助批判作为实证主义新形态的经验批判主义,有力回击了俄国经验一元论者打着科学的名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在理论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批判性与革命性。因而,面对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的“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理论重任,我们有必要回到列宁的文本及思想深处,重新考察列宁在批判实证主义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出的理论贡献,吸收、借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的理论思考,以此完整把握列宁作为革命家与思想家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者形象,助力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场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以此“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

收稿日期:2024-11-27

作者简介:赵立,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辩证与实证之争视角下的‘晚年恩格斯问题’研究”(23ZXC0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7批特别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批判实证主义的历史、逻辑与反思研究”(2024T17040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人本与实证之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23M7416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1]。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交付给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使命。

一、实证主义新形态：以科学为名的经验批判主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科学发展遭遇了巨大危机，导致自 17 世纪形成的静态宇宙结构与 19 世纪生成的实证主义思想遭遇巨大冲击。在自然科学层面，伽利略和牛顿发现的机械宇宙图景不断受到质疑，爱因斯坦描述的相对论宇宙图景获得了最终胜利；在社会科学层面，“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与科学，优生学、遗传学又以“选择”“突变”学说反过来增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性”。科学的进展引发了哲学思想的连锁反应，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大潮下，实证主义因时而变，发展出了新形态的实证主义学说。这一新形态较之于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虽然依然坚持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对纯粹经验的肯定，但是却不再追求一个理性的、由因果论和决定论支配的、井井有条和包罗万象的自然与社会，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即从价值中立的角度出发，重建科学的根基并加以公式化和定理化。只不过，真理的判定不再是所谓的与“真实世界”相符，而是以是否满足经验标准的“有用性”为依据。作为对 19 世纪实证主义的反动，“约定论”的观点削弱了大众对于科学结果具有“客观性”和“有效性”的乐观与自信，进而消解了科学认识“事实”与纯粹经验的可能性，科学法则的有效性仅在于人们对其进行解读的预先“约定”，而这种“约定”具有认识效力的原因在于其经济、方便、有用，甚至仅仅是符合审美特性。

实证主义新形态具体表现为经验批判主义（又称“马赫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经验批判主义标榜自身是“唯一的科学”，宣称要效仿康德为知识的确定性划界，只不过其依据的是所谓“纯粹”经验，因而以经验和

批判来命名。这一时期，物理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进展使得传统的科学标准受到人们的强烈质疑，进而导致世界观、价值观、真理观都失去了坚实地基。在此背景下，作为物理学家的马赫“跨界”到哲学，打着“中立”的旗号，试图运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重塑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马赫看来，物理学中的“声、色、温、时、空”等要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合起来；心理学中的“心情、感情与意志”等也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这两种要素的结合所形成的相对稳定、持久的部分因为其显著性而被铭刻在记忆中，并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物理要素结合而成的复合体就是物体，而心理要素结合而成的复合体则是自我，两者都不是绝对恒久的；这些复合体表面上的区别都禁不起仔细考察，因为实质上不过是构成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因此，马赫提出，实在与假象的关系不过是因为条件不同而呈现出的要素的不同结合罢了。通过这种方式，马赫将物理科学与心理科学统一了起来，并将人们的认识定位于感觉之上，“由于常有同类的事情，我们最后就习惯于认为物体的一切特性都是由常久核心出发，通过身体的中介而传到自我的‘作用’；我们把这种作用叫做感觉。……这些核心便失去了它们的全部感觉内容，变成赤裸裸的思想符号了。因而，说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这是正确的。这样一来，我们的知识也就仅仅是关于感觉的知识”^[2]。由此，马赫取消了“物自体”存在的必要性，打通了外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界限，消解了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图景，将人类的感覺指认为科学知识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则只是人们对经验符号的体系化、经济化记录。整体来看，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同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相比，都是从主体出发，强调感官经验的重要性，抛弃形而上学而强调科学对于人类的價值。但是，这种将自我定位为与物理因素统一的符号抽象，过分凸显了自我的实际目的或作用，而完全贬低了作为主体的人类的價值，必将导致对于人类价值的虚无认识。

实证主义新形态对于人类价值的虚无认识与社会大众对进步预期的失调显著相关。其实，孔德的实证主义就是对启蒙运动以来宣称的理性国家失望的产物，“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的和非正义的”^[3]。到了世纪之交，一直为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所鼓舞的欧洲大众愕然发现，曾经信赖有加的科学遭遇了“危机与颠覆”，期冀的美好未来频频落空，发展与进步主义的想象再也无法延续，进而意识到潜藏的危机即将爆发。这一点在知识分子中尤为显著。尼采认为，自然科学导致了西方文明自身内部的崩溃，必将走向颓废与虚无，因而有必要“重估一切价值”。尼采的悲观主义论调并非一家之言，而是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知识分子的普遍之感，并获得了西方大众的热烈追捧。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之所以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正是与这种社会群体的普遍认识和心理密切相关。

这种进步信念的崩塌、对于科学标准的怀疑和人类价值的虚无，凸显了西方文明在长久沉迷于实证主义意识形态下一朝惊醒时的“惊慌失措”。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生成的实证主义新形态，看似迎合了科学发展的新形势，并极力抬高主体的认识价值，试图以此为主体划定存在的空间，殊不知，这种挖空科学确定性之基的做法只会加剧文明的危机。时代变迁下的文明危机必然引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未来的新思考，曾经被“沉默”对待的马克思主义在受众和地域上都获得了广泛传播，“在欧洲大陆，可以说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主义所‘俘获’。到了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导”^[4]。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真正基石，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盲目引入实证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这种削足适履的行为不仅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反而斩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基，使得第二国际在革命形势面临历史机遇的时刻，就像泥足巨人一般“寸步难行”，无法整合

国际工人的革命潜能，在西方文明危机的大变局中错失良机。

第二国际的理论破产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破产。可以说，正是这一理论“修正”敦促我们去反思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他们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是与旧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作为研究工作指南的唯物史观，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强调历史与辩证的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历史与辩证的统一。进而，马克思主义就不会驻足于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也不会留恋于体系哲学的思辨想象，而是将自然与历史统一于辩证发展的过程中来理解。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始终保持自身的理论定力，不因为现实历史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理论立场的摇摆，而是在与现实历史和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中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种发展性、实践性与逻辑性正是马克思主义超越实证主义的理论底气。面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走入的理论误区，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与历史的统一”为理论武器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之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对于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唯一科学？实证主义俄国版本的理论挑战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交锋，实证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面对的“老对手”“熟面孔”。当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巩固了自身的理论指导地位后，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就“改头换面”，潜入马克思主义内部以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继续理论交锋，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修正”就是这种理论斗争的表现，在俄国则体现为拥护经验批判主义的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经验一元论”。那么，从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证主义为什么会不可避免地“侵入”马克思主义呢？

马克思主义自 19 世纪 60 年代传入俄国后，逐渐吸引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并在普列汉诺夫的努力推动下，在俄国获得了广泛传播，列宁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因为革命目标相异，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产生了分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就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义者”、认同伯恩斯坦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等不同派别。1905 年前后，俄国爆发了大规模民主革命运动，掀起了巴黎公社后世界工人运动的又一次高潮，但是由于组织不力、目标涣散、斗争力量没有统一，这次革命最终走向低潮与失败。此外，自然科学发展引发的物质“坍塌”危机也传入俄国，在对革命前途失望迷茫和对自然科学知识客观性怀疑的背景下，经验批判主义迎合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部分理论家的需求，被奉为“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科学”，并试图借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

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就是经验批判主义在俄国的理论变种。1904 年至 1906 年间，波格丹诺夫出版了三卷本的《经验一元论》，力图以经验批判主义为基底改造马克思主义。波格丹诺夫“化用”了马赫的“世界要素说”，将世界视为由感觉经验这一中立性要素构成的不断发展的长链，其中物理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不外是经验以不同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形式构成了物理的东西；个人形式构成了心理的东西。波格丹诺夫认为自己的理论克服了二元论的对立，超越了唯物主义的“过时”物质观，为人类认识开辟了新的方向。但是如果追问其认识的根源，波格丹诺夫却又提出自己的认识与精神都来自物理经验，因而与唯物主义并不冲突。例如，波格丹诺夫指出，人明确自身存在首先是有自身的直接体验，其次是体验到他人和他物，进而形成了对社会的认识与经验。如果我们审视波格丹诺夫的认识论链条，“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从感觉要素 → 心理经验 → 物理经验 → 认识、精神而不断发展的”^[5]，

很容易发现这种所谓的物理经验不过是来自所谓中性的感觉要素，和马赫的感觉经验一脉相承罢了，因为归根结底，人的存在也是要追溯到中立性的感觉要素处。在波格丹诺夫看来，因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在感觉要素中消融在了一起，因而产生了不分彼此的同一，也就无所谓物质与精神了。

如何理解这种所谓的中立性呢？从物理学出发来解释就较好理解。世纪之交，传统物理学中所认为的实体存在的原子被以带负电荷电子云的原子形式所取代，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就是物质存在被否定，而个人的感觉攫取了“物质基础”之位。从这一认识出发，波格丹诺夫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然“过时”了，表现在对真理的认识上，真理不过是人所公认的社会存在，只要获得了多数人的承认就是真理，因而真理也就失去了绝对性，只能以相对性的形式存在，这本质上是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思维的经济原理的发挥；表现在对社会的认识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同一的，对社会意识进行教育就能够实现对社会存在的调整，从而“弥合”社会现实中的对立与差异，进而从理论上“消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

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表面上看是实证主义借助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从哲学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展开的理论反扑。但是在俄国革命低潮的背景下，其实质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关于革命前途的路线之争。从“经验一元论”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否定理解出发，波格丹诺夫和孟什维克派对俄国革命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主张：波格丹诺夫一派主张召回杜马代表和公开活动的党员，转入秘密斗争；孟什维克派则主张取消革命团体，全面转入公开活动，走伯恩斯坦提出的议会斗争路线。这两条革命路线实质上都是倒向了实证主义的路线，因而无一例外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路线与策略。列宁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在策略路线上的分歧和争论实际上是哲学上两条认识路线的争论在党的工

作中的反映”^[6]。这一实际革命斗争的要求成为列宁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早在1906年，列宁就曾考虑过回应波格丹诺夫并写下了《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札记》，但是较之于哲学争论，革命的紧迫性与现实性使得列宁并未将之公开发表。随着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在俄国出版，布尔什维克党内在哲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日益尖锐化、公开化，“我们的经验批判论者、经验一元论者和经验符号论者都在往泥潭里爬。……他们宣称不可知论的变种（经验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变种（经验一元论）……宣布恩格斯的辩证法学说为神秘主义……为什么要这样欺辱我们，竟要把这些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奉送给我们”^[7]。为此，列宁着手搜集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文献，于1908年撰写完成了《唯批》。《唯批》的出版代表着列宁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现实实践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与革命立场的内在统一性，因此，“只能是向自己的政治同志进行哲学思想路线上的坚决斗争，而要斗争，就必须有理论思想武器”^[8]。这一理论思想武器就是“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的马克思主义。

三、回击实证主义：列宁的“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之思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汇聚在同一面旗帜下反对共同敌人的不同思想派别的组合，这就使得不同的思想派别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在思想上也就无法达成一致。淬炼“一整块钢”需要高温与锻造，而打造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整体也同样需要革命之火与不同思想之间的激烈碰撞，列宁正是在与实证主义的公开斗争中，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与革命之魂，从而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唯批》的副标题是“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顾名思义就是以唯物主义的哲学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回击，而“反动

哲学”则表明了《唯批》的阶级立场。部分西方学者片面地从哲学维度或政治维度的单一视角切入，塑造出不成熟的“哲学学徒”或谋于政治的“党派领导人”形象，这一做法不仅撕裂了列宁的完整形象，而且使我们不能完整理解列宁在《唯批》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创新思考。阿尔都塞提醒我们，《唯批》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因为列宁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理论意图，即不是寻求构建一种体系哲学，而是创造一种新的基于无产阶级哲学立场的哲学实践。这为我们理解列宁提供了理论“路标”，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与实践追求的统一中切入对《唯批》的理解，如此方能完整把握列宁朝向哲学与革命问题的思考。在此，我们从列宁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中展开探索。

第一，列宁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坚决驳斥了经验批判主义的“物质观”。什么是“物质”？“物质”消失了吗？从一般经验来看，人类时刻都在和各种物质打交道，经验生活中的“物”就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有些甚至就是现成“在手”之物，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中。那么为什么会说实证主义使“物质”消失了呢？原因在于，经验批判主义将“物质”视为所谓中立性的“要素”，认为这一“要素”嫁接了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自我由此得以“感觉”到颜色、声音、空间、时间等，这种被清洗过的“完全经验”就克服了心物二元对立，在第三条路线上走向了“唯一科学”。这种所谓的中立性世界图景不过是一场骗局，因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是好理解的，但是谁能够确切地说出“第三种东西”呢？全部哲学所关注的重大基本问题只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除此之外并无“第三种东西”，沿着经验批判主义的逻辑走下去只会抵达“荒谬的唯我论”终点，也即将整个世界架构于个人的主观地基之上。因此，在列宁看来，“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

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9]。而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只是在“宣称自我是第一性的（中心项），自然界（环境）是第二性的（对立项）”^[10]。具有客观实在特性的物质并没有消失，消失的恰恰是经验批判主义者眼中固定的、永恒不变的所谓“物质”，因此，当自然科学的新进展使得人类认识边界得以拓展，经验批判主义者的“物质”似乎就被推翻了，使得一瞬间人类就再无“立足之地”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在列宁看来，自然科学一举推翻的是机械唯物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者欢呼的物理科学新成就反而印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客观实在的物质始终存在着，也不断被发现与研究，而非被人类的意识“发明与创造”。在这一点上，恩格斯通过实验与工业的实践对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的终结就是最好的说明，因为“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11]。列宁亦从客观实在的物质特性出发，阐明了人类认识的必然性，因而指出“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12]，因为我们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知到比较完全知”“从不确切知到比较确切知”。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人类当然抵达不到“永恒真理”的彼岸，但是却在“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此岸历史性地前进着。列宁对于“物质”的阐发绝非囿于直观的经验现实，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超感觉”的物，而是处在关系与过程之中的客观实在，并以此打开了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真理之门”。相较而言，经验批判主义所持有的中立“要素”论只会将人类引向主观的、不可知的、神秘的虚无场域。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主义立场没有也不会“过时”！

第二，列宁以唯物辩证法回击了经验批判主

义的相对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必然是相对主义的，从感觉经验出发无法抵达确定性的终点。经验批判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认识思维的经济原理，其强调陈述并不增加特殊的事实，而只是帮助人们涵盖、理解事实的特征，由此，形而上学的超越性概念被消解了意义。对于经验批判主义来说，强调“完全经验”需要呼唤出认识思维的经济原理的咒语，而同样的，也只有利用经济原理才能推导出“完全经验”的概念，两者是“本体”与“方法”的关系。认识思维的经济原理无疑是相对主义的，因为这一原理在区分经验事实与理论时完全凭借个人的感觉，但个人感觉的变动将引发概念的流变，使得确定性在经验的地基上“丧失自身”，知识、真理因而只剩下了相对性。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经济原理出发最终只能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真正的“经济”认识只有在思维正确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衡量这一正确性的标准则是人类的“实践、实验与工业”。

经验批判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列宁指出，有些自然科学家正是由于不懂得辩证法，结果就在相对主义的诱导下走向了唯心主义，认识思维的经济原理只会使得信奉者在个人主观的基础上滑向不可知论与诡辩论。马克思主义当然反对“永恒真理”，但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使得人类把握真理具有了可能。不承认“永恒真理”并不可以化约为不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人类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深化的、动态的过程，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始终在辩证中前进，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避免了沦为僵化教条或走向不可知论的深渊。列宁由此肯定：“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13]此外，列宁强调哲学的党性，但又不是简单的政治层面的路线之争。因为哲学的党性不是列宁“特意”用来在革命者之间进行区分的“理论红线”，而是有着其自身的理论逻辑

与命意，所谓的党性就是指哲学立场的派别性与阶级性。从这一立场出发，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法自然将始终屹立于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既不会在哲学上摇摆到所谓的第三种立场，也不会向资产阶级卑躬屈膝，而是始终坚守一个理论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14]。

第三，列宁指认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在于“辩证与历史统一”基础上的革命导向，坚决反对经验批判主义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同一”。经验批判主义的主观主义和资产阶级立场使得其在社会历史观上必然反对革命，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同一”。经验批判主义从人类的主观意识出发，认为组织起来的人类在相互交往的社会生活形成了人类的社会存在，因此二者是内在同一的，这里其实是将社会存在混同为社会关系，强行将二者画等号。经验批判主义者无法否认社会存在的对立与差异，但是却将之解释为社会意识中的对立与差异，并归咎于文化教育的原因，将解决社会现实存在的对立与差异的重任寄托于文化教育之上。列宁指出，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而视之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法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但是依然在社会生活中交往与联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差异表现在文化教育上，但并不是文化教育导致了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差异，因为在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还未产生的时候，人类已经在创造文化、进行教育了。

列宁明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即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15]。由是，这一新历史观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基础上辩证与历史的统一，即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在实践中现实地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列宁并非仅仅着眼于对“唯物”的强调，而是要求哲学与革命维度的“辩证与历史统一”，

强调了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革命能动性。部分西方学者批评列宁这一时期的思想是一般唯物主义，这是对列宁的理论误认。在列宁看来，正是立足于“客观实在”的人类实践使得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能够创造客观世界，进而以实践能力绘制“客观实在”的世界图景。

总的来说，列宁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的理论思考，深刻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的物质观、相对主义真理观与非历史立场，在理论斗争实践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因此，从后来的理论效应来看，这是列宁为经济落后的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探索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为十月革命发出了实践的、能动的辩证法先声，解答了坚持唯物主义与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理论难题，值得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深入领悟与借鉴。

四、淬炼“一整块钢”：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当代意义

必须认识到，作为实证主义新形态，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不能简单地从“唯物与唯心”的二元对立进行批判，而是需要从辩证的角度展开分析。列宁正是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从哲学研究与革命实践的双重维度出发，展开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最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深化与理论推进。在当代，我们同样遭遇到实证主义的理论侵袭，其借助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声势，大肆宣扬自身的“科学性”，并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社会与科技的认知。因而，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充分挖掘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创新“宝藏”，可以为我们在技术时代批判反思人与技术社会的关系问题提供启示，从而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首先，为了批判实证主义，列宁第一次认真投身到系统的哲学研究之中。在着手写作《唯批》之前，列宁已然意识到自身在哲学修养方面的不足，他鲜少在某些复杂的哲学问题上公开发

表意见。然而，面对经验批判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使得列宁不得不做出反击。通过在日内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深入钻研大量哲学与自然科学图书，列宁在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奠定了列宁此后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也为他更加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领导现代思想斗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16]。《唯批》之所以在列宁思想发展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在于列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直面新的历史条件，迎接理论和革命斗争的。历史形式本身与理论的客观逻辑使得列宁思考的出发点并不只是简单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从“唯物、辩证与历史的统一”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深度阐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即列宁“对哲学唯物主义的保卫和发展是通过与唯物主义处于内在统一中的辩证法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得到实现的”^[17]。列宁深刻意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8]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批判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抗击实证主义者在理论与革命立场上的退却，这是理论任务更是革命要求。

其次，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是一个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唯批》的写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在凯文·安德森看来，列宁开始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1914年8月至11月，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作“卡尔·马克思”词条期间。在此之前，无论是1894年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激烈攻击”，还是在1908年持有与经验批判主义者一样的“实证的和科学的”哲学立场，列宁都“极度远离黑格尔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19]。安德森的指认其实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列宁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列宁的思想基底。列宁在1894年的首次哲学亮相中，从现实和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出发，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

“形式性”，坚持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基础与理论起点。1908年，列宁从时代的哲学之问出发，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目的为念，将研究焦点放在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专注于批判“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认识论思想。1910年，列宁明确提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根本的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任务之间的关键联系^[20]。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深刻体认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作用，从而产生了进一步研究的内生动力，具体表现为1914年的《哲学笔记》。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明确提出“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21]。在此意义上，列宁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基于社会历史生活的革命辩证法，吹响了布尔什维克向沙皇俄国冲锋的革命号角。

最后，在理解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的实践性解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明确，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捍卫理论与创新运用是一体两面的，二者相辅相成。列宁直面实证主义的理论冲击，朝向哲学与革命问题展开理论思考，一方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意，另一方面以立足实践与革命的辩证之思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通向20世纪的理论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方能在面对时代新精神和实践新形势时展现旺盛的理论生命力，进而在纷繁复杂的理论斗争中捍卫其科学性、批判性与革命性。于我们而言，就是要牢固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实践地基，吸收借鉴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思想与方法成果，直面技术时代“辩证与实证之争”的新形态^[22]，展开基于当代中国立场的理论反思，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21世纪的广阔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

-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7-18.
- [2] 马赫.感觉的分析[M].洪谦,唐钺,梁志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8.
- [4] 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上册)[M].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
- [5]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50.
- [6]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27.
- [7] 列宁全集:第四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82.
- [8] 张一兵.列宁第一次系统哲学理论学习的背景[J].江西社会科学,2007(9):65.
- [9][10][12][13][14][15] 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9、108、77、97、229、225.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2.
- [16] 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19.
- [17] 凯德洛夫.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M].贾泽林,周国平,苏国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56.
- [18] 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1.
- [19] 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M].张传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28.
- [20]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84.
- [21]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54.
- [22] 赵立.辩证与实证之争:技术时代的实证主义批判与反思[J].南京社会科学,2024(11):26.

责任编辑:尔东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成审视、 内在机理与实施进路

李明旭

摘要:明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内在机理是进一步健全该体系的基本前提。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党的组织体系是其运转的载体依托、教育体系是其长效运行的动力引擎、监管体系是预防治理偏差的保险机制、制度体系是施治有序的秩序支撑、责任体系是确保落实到位的成效保障,五者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共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发挥效能优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实践中呈现出运行逻辑上正向引导与逆向调控相结合、策略方法上思想建党与依规治党相贯通、思维观念上统筹兼顾与精准施策相统一的内在机理。迈进新征程,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坚持“党要管党”、创新“党建理论”、落实“四全要求”、推进“联动集成”。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党的建设;构成要素;内在机理;进路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命题,是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1],并从组织、教育、监管、制度及责任体系等五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新征程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着力点和要求。从“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到“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再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标志着新时代全

面从严治党实践发展到了新的阶段。目前,学术界已就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基础理论、发展历程、建设实践和完善策略等进行了广泛探讨,但要深入理解构建这一体系的内在逻辑,从而为进一步健全体系提供理论指引,还需要更为深入地认识体系内部各要素的功能定位、内在机理及健全体系的实施进路。

一、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成审视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首先要明确这一体系的要素构成及其功能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收稿日期:2024-10-17

作者简介:李明旭,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总体逻辑及实现机制研究”(22&ZD02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22JHQ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2]“体系”是若干要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所谓“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指构成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容要素及其按照规律性联系所耦合形成并完整呈现的制度形态，是推动、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并为其提供法理依托与实践保障的子系统的有机统一。

（一）党的组织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运行载体

在社会领域，任何体系或系统的生成、发展与运转都源于主体的推动。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党的组织体系具有核心地位，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借助中国共产党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具备了坚实的组织支撑和重要助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系统工程，要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必须发挥党的组织优势”^[3]。因此，健全党的组织体系是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发挥体系效能优势的首要任务。

一方面，党的组织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了运行框架。党的组织体系是党一切工作的力量依托，是党进行工作决策、实践执行和效果监督的基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4]。这种覆盖全国、上下一体的立体结构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开展提供了运行架构，确保党的决策能够迅速且有效地传达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使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5]，保障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得到切实落实。实践中，党的各级组织和机构都有其特定的职责和功能：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领导核心，负责制定全面从严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并发挥引领示

范作用；地方组织位于中央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坚决执行中央政策及上级指示、决策，维护中央权威，确保央地政令畅通，也要为下级党组织的工作指明方向和提出要求，并对其工作情况予以监督检查；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神经末梢”，是开展和检验全面从严治党及其实效的重要阵地。

另一方面，党的组织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了推动力量。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史，拥有庞大组织体系的政党不在少数，但能够实现长效治理的却寥寥无几，以苏共为代表的部分政党，其庞大的组织体系反而成为治理的阻碍。“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6]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自我革命解决自身问题，不仅在于结构合理、覆盖全面的组织架构，还源于纪律严明、执行有力的组织力量。党高度的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实的力量保障。自诞生之日起，党就以组织纪律严明著称，注重以组织力量执行党的政策、领导各项工作。革命时期，党即明确自身“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7]，在各个历史时期重视以党的团结统一和组织有力保障自身建设质量。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强大组织力量的支撑。新时代，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能够迅速调动各种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能够得到有效执行，避免出现形式主义和走过场的情况。

（二）党内教育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长效引擎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转向自觉主动方能长效，而要转向自觉主动必须加强思想建设和党内教育，使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对为何“治”，“治”何物及如何“治”具有清醒认知。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和长期性决定了从严治党必须从思想发力，将全面从严治党转化为全体党

员的自觉行动。因此，教育体系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具有引领性、贯通性、支配性的作用，旨在通过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党性修养改造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强化党员的意识 and 组织观念，提高管党治党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其一，党内教育是提高从严治党质量的重要方面。党内的突出问题既源于外部环境的挑战，也源于错误思想对党员干部主观世界的腐蚀。因此，改造党员的主观世界，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价值观和义利观是增强其自我约束意识，实现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革命时期，党就将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通过对党员进行定期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从而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新时代，党进一步明确了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从正向来看，党内教育的开展能够进一步明晰党员对责任和使命的认知，提高其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准，形成自我约束意识。同时，教育也是提升专业技能、领导能力、决策能力等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使党员能够更好地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从反面来看，党内教育的及时开展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党员在思想、行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确保全党始终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一致。

其二，党内教育是淬炼自我革命意识的基础环节。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8]，将“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持续推进党内教育常态化，准确把握党的重大会议、纪念活动等历史契机，适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集中教育。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工作、推动实践，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

持一致，涵养全体党员的自我革命精神，有力激活广大党员干部创业的主动精神，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向自觉主动的转变。

其三，党内教育是营造风清气正生态的应然之举。环境的改变与主体的实践活动是相辅相成的。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影响着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和作风形象。党内教育的影响具有潜在性和长期性，通过党内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培养其干事创业、自我管理、相互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逐步在党内形成风清气正的生态环境与干事创业的正向氛围，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抵制不良风气的侵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三）监督管理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保险机制

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具有一体两面的角色定位：既是发动者、执行者又是规范对象。这就要求党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从而建立防线、预防偏差。监管体系融合了监督体系与管理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也是维护党的纪律和规矩、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的重要手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权力的正确运用均需通过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系来实现，从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过程、全方位、全链条筑牢防线，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保证成效。

建立健全管理体系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应有之义。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最终目的是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加强对党的组织系统和人员的管理是其必然要求。新时代，党注重加强自身管理，颁布实施《关于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等多项法规文件，对党的组织生活、组织工作、党员发展等各个方面进行明确规定，推动完善自身管理体系。同时，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坚

持党管干部”是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开展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从严管理党员，更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管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9]因此，建立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

建立健全监督体系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要方面。“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10]中国共产党强调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确保权力的正确运用。新时代以来，党制定并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党内监督带动民主监督，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建立覆盖全面、权威高效的监督网络，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

（四）制度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秩序支撑

全面从严治党的严要求与常态化需要相应的规范来保障其正确运行。“全面从严治党是涉及管党治党全流程、全方位、全领域的复合体，需要常态化和长效化的制度机制予以有力保障。”^[11]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有规可依、有制可循，从而消除管党治党的个人化特质与随意性因素，确保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序开展并尽可能杜绝偏差。同时，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保证单个方面的规范运行，也要协调各个方面的有序开展，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其提供必要的秩序支撑。

首先，制度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有序开展的秩序遵循。制度将管党治党的内容对象、程序机制、保障方式和监督职责等以明确的规范形式予以确认，为其实践展开提供法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顽瘴痼疾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12]。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具体展开需要明确工作界限、责任划分、方法依托，因此必须通过制定和完善各项党内法规，如党章、廉洁自律准则、纪

律处分条例等，以制度化形式明确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和纪律要求，从而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南，帮助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规定，提高党性修养，提高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效。同时，程序性制度还能够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集中统一领导。

其次，制度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各个环节提供衔接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13]。党的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为统筹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提供衔接机制。制度体系包含的一系列流程和程序规范为各环节之间的衔接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促进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各要素、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制度的贯穿能够统合体系各构件的功能，形成有序衔接并动态关联、彼此协作的链式反应，有利于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效能跃迁。

最后，制度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效提供评判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判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要以党章为基本标准”^[14]。制度作为主体的行为规范，既能从正面为主体实践活动提供路径选择，亦能从侧面成为评判主体行为的依据。因此，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全领域的制度体系能够为其他体系的运行和主体的实践行为提供科学、合理的衡量尺度，压缩党内非制度化行为的的活动空间，提高主体行为的预期性。新时代以来，党基本建成了以党章为根本，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以部委党内法规、地方党内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提供了规范标准及评价依据。

（五）责任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实效保障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执行制度则需要有明确主体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

到的。”^[15]全面从严治党面向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党组织的各个层级，但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身份的党组织和党员在国家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应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因而面临的具体任务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具体部署和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时，必须坚持“权责一致、有权必有责”，明确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责任、义务、权限。同时，建立问责机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是健全明确的主体责任。明确全面从严治党中各主体的政治责任、工作责任和监督责任是首要问题。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建设主体责任为抓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党委要管、党委书记要管。党委书记要在其位、谋其政，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16]，出台《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文件，将主体责任以明确的党内法规形式加以确认，形成了系统完整、层层传导的责任体系，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责任基础。

二是完善严格的问责机制。党的二十大强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17]。以责任追究确保责任落实，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新时代以来，党形成了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重视建构全面从严治党问责机制以推动从严治党实践。相继制定、颁布或修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文件，明晰了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和问责情形，确保各级行为主体按照应当遵循的纪律和规矩有序行事。

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在机理

（一）运行逻辑：正向引导与压力传导相结合

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18]，将持久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项长期性、明示性要求予以

固定，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顶层设计与部署运行必须“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19]。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吸收了党长期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思想，“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20]。这一体系既注重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明确主体责任、加强教育，引领全党持续增强管党治党意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被动向自觉转变；也重视严明纪律、纪严于法，以法规制度体系规范运行，在运行逻辑上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体现出主导推进与压力推动双向发力的显著特征。

一方面，“自律”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保持长效运转的前提基础。全面从严治党是需要全党共同努力的长期工程，使严要求成为全体党员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和自觉意识是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视提高主体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增强全党解决自身问题、实现自我革命的恒心与韧劲。党的十九大将“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21]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首位，“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22]。十余年来，党坚持以教育引导、严管厚爱、信任激励等方式克服与防范党员和干部“松劲歇脚、疲劳厌战”情绪，培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转化为全体党员的自觉行动，有力克服了体系贯彻的阻力、保障了实践的持久推进。

另一方面，“他律”是全面从严治党不流于形式的根本保障。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严的基调管党治党，通过内外监督、纪律约束、责任追究和反腐败斗争形成有力的压力传导机制推动责任落实、保障体系运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23]新时代，党以“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纪法贯通”的要求强化纪律建设，明确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的重要论断，通过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有力确保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规范运行。同时，不断加强监督巡视，对于出现的问题进行督促整改，以监督问责确保各级主体围绕“责任”二字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二）策略方法：思想建党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坚持思想建党与依规治党相统一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二者一柔一刚、刚柔相济，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24]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只有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真正认同和接受党的纪律和规矩，才能自觉遵守和执行；依规治党则为思想建党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实践支撑，通过严格的制度执行和纪律约束，推动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25]，因此，同步推进理论武装和党内法规建设，才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突出成就。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相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六次集中教育活动，从思想发力，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着力增强全体党员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为自觉，推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切实成为管党治党的领导者、推动者和执行者，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夯实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能力基础。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即注重以制度的刚性约束严格规范自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26]。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高党规党法对党的建设的规范牵引作用，从顶层设计着手，适时开展党内法规清理工作，修改或废止一批不合时宜的党内法规，基本形成了贯穿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等各个领域的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使制度“长牙”、纪律“带电”，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化、规范化提供制度力量。

（三）实施路径：统筹兼顾与精准施策相贯通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既需要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也要有具体的任务分解和实践举措。坚持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方面，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在顶层设计上贯彻系统观念，重视“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27]。一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全局定位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发展路径，结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新时代，党中央从自我革命、社会革命、党的领导相结合的高度统筹谋划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的整体性、全面性和长期性，注重治党与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的衔接与协调。二是在体系结构上坚持系统施治，统筹协调党的各方面建设，循序渐进、层次分明，注重各要素衔接，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理实效。

另一方面，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在贯彻落实上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忧患意识，实现精准施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注重抓党的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围绕党面临的“四大风

险”“四大考验”与“大党独有难题”于动态实践中逐步补齐制度短板，推出一系列事关长远、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对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等各方面建设均开展系统部署，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涉及各个方面的专门性文件，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法规条例。同时，推动落实具体领域、各环节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注重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抓实抓细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实施进路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需要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着力“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

（一）把稳方向性：坚持“党要管党”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全面从严治党的方向性问题从根上决定管党治党的最终成效、前途命运。“治党”是政党政治的永恒主题，牢固“治党”的政治方向是保障治理成效的根本要求。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28]。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共产党“党领导国家”的政治逻辑决定了治理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以自身力量为主导，从而确保党的先进性和根基不动摇。因此，明确“党要管党”，坚持党对全面从严治党全方位、全链条、全过程的领导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要前提和贯穿始终的原则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新时代党将政治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明确其对党的建设的统领作用，着力推动全党把稳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其一，要坚持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大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维护”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进党的

自我革命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把握方向、指明道路。新征程上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将坚持“两个确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二，应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各个部分、全部过程之中。“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本质上是关于领导权及其归属、运行、效能发挥的制度规范”^[29]，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要体现在各个方面。要以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为重要抓手，以制度化的形式确保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在从严治党中的主体地位和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而把稳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方向，保障管党治党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二）提升自觉性：创新“党建理论”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符合规律性是实践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30]。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系统化、体系化要求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提升体系的科学性。新征程上“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全面从严治党必然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因此，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党建理论创新，从而以更加科学、更加有效的理论指导提升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的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需要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而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自我革命的有效路径。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要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以自我革命为目标导向，探索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推进党建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创新党建理论是为了深化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因此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并通过体系化、学理化的方式将零散的知识整合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从而提高其科学性和准确性，使主体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更好地用以指导实践，是提升实践成效的必然之举。

（三）彰显彻底性：落实“四全要求”

管党治党实践的常态化和全面性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从共时性来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应覆盖一切管党治党相关领域、各项工作。从历时性来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贯通过去、现在和将来，既要使已有问题及时合理解决，也要对未来增量有充分预计，随党的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31]，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

一是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全面从严治党没有禁区，其直接目的是要“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32]。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风险挑战是内外因素相互叠加造成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要对涉及坚持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层级、环节加以涵盖。

二是坚持“对象上全覆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33]。首先，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应以党的组织为基点。组织是党教育、管理党员，践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阵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在组织机构、结构关系、运行方式上着力提升从严治党的执行力。其次，要抓住“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的重点，在于从严管理干部。”^[34]党的各级干部身处关键岗位、掌握公共权力，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应特别重视对干部的引导与约束，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最后，要做到管好“绝大多数”。基层党员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因此“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35]，加强党内教育，以

形成同心协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良好局面。

三是坚持“责任上全链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能不能落到实处关键在于“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抓没抓住”^[36]。其一，进一步明确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及监督责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培养全体党员的责任意识，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责任格局。其二，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坚持敢问责、严问责、常问责，紧盯失职失责问题，落实“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要求。

四是坚持“制度上全贯通”。制度具有根本性和长期性，是“实现管党治党的多方力量整合、多种要素聚合、多维功能融合”的制度支撑。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核心，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各个环节提供行为规范。同时，“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37]，因此要狠抓制度落实、严肃纪律意识，对违法违纪“零容忍”，提升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四）增强耦合性：推进“联动集成”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个涵盖多个子体系的动态系统，其体系效能的正常发挥既有赖于各要素的健全程度，更有赖于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衔接运转。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党是决定整个系统高效运行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最高政治力量，党的领导制度是根本领导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中的定位，更加凸显出党自身建设的情况、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决定意义。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不仅要贯通体系自身，更要协调好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才能使改革走向深入。

一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衔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

动集成、协同协调”^[38]。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由多个子体系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系统。各子体系面向的是同一主体的不同领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其作用机理的差异性决定了运行中各子体系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存在着次序差异和运行规律。故必须按照体系内部的结构关系，加强各子体系之间的衔接协调方能最大限度发挥体系效能。因此，应将制度体系贯穿各体系之中，搭建起体系运转的“四梁八柱”，在顶层设计、实践措施上推进各要素沟通联动、同步建设，从而保证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高效运行。

二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相协调。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充分理顺其与国家治理体系的边界及联系，将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要充分考虑国家治理的整体布局和需求，确保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在目标上一致、在功能上互补、在结构上优化，从而保证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N]. 人民日报, 2024-06-29(1).
- [2][13][38] 习近平.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J]. 求是, 2023(12): 7、7、7.
- [3][10][21][24][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216、191、555、188、189.
- [4][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86、50.
- [5] 习近平.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2.
- [6][17][18][2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67、66、64、21.
- [7] 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79.
- [8] 习近平.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J]. 求是, 2024(6): 7.
- [9][14][37]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110、51、55.
- [11] 唐皇凤.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新时代的基本经验与新征程的优化路径 [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3(3): 17.
- [12][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99、95.
- [15][16][20][23][33][34][35][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224、221、68、98、11、134、181、228.
-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376.
- [2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509.
- [2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70.
- [29] 张振, 杨玉城. 制度哲学视域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结构与功能探析 [J]. 理论探讨, 2024(1): 16.
- [31]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N]. 人民日报, 2023-01-10(1).
- [3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9.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唯物史观向度

徐龙建

摘要:基于唯物史观视角,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与一定社会存在相适应的中华文明的积极肯认和向善向新发展,是人们生产实践尤其是文化实践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发展之必然与应然的统一。作为上层建筑、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集中展现的现代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印证出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其主体能动性和社会制约性之间辩证统一。通过提高文化生产力、推进“第二个结合”、共享文化成果把握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格局、叙事与前景,从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唯物史观;社会存在;能动性;实践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作为一种客观现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语境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否定了脱离物质生产实践讨论文明发展的思想误区,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确立了“物质力量”;同时,在社会意识的范畴,又高度重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尊重文明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否定文明决定论,努力克服一切阻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制约因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能动性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关系,通过提高文化生产力、推进“第二个结合”、

共享文化成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筑牢实践基础、提供不竭动力、构筑最强支撑,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社会存在

在社会有机体中,社会历史现象是形形色色的,大致可以分为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两个方面,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不是先验的、神赐的、永恒不变的自在之物,也不是理性、精神、

收稿日期:2024-10-20

作者简介:徐龙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以红色文化涵养党内政治文化路径研究”(21CKS0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意识的派生物，而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前提，在人们的生产实践，尤其是文化实践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生产方式发展之必然与应然的统一。

一方面，从文明形成的人类发生学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进步的社会历史产物。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是人们的活动模式，狭义的文明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观念体系，是文化中的精华。劳动为人类社会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3]。人通过劳动自觉地改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地使“自在”的关系成为“自我”的关系。在人们劳动和交往中形成的抽象思维、自我意识特别是语言，促进了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4]有了原始文化就有了原始形态的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之时，随着人们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需要的凝聚、强化和调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对外界关系的真实反映，是人精神文化需要的必然结果，是人的自然形成、社会形成、心理形成的产物，也是人的生产需要、社会需要和自身需要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非先验性、历史性、受动性，而且始终将其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角中，并以“物质生产实践”“人类社会实践”为最终决定性因素进行讨论和考察，从而科学揭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历史本质。

另一方面，从文明个体意识形成的过程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依赖于客观社会物质现实及一定的心理机制。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生产力是人们利用

和改造自然，并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一般而言，人们只有在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时，才有对文化的需要，有了对文化的需要，才有了建设文明的可能。马克思指出，“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5]，而只有“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准备”^[6]之时，人们才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7]。恩格斯也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8]因此，只有充分发展和释放生产力，使精神和物质生产的分工得以更好地实现，文化才能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生成。其次，生产关系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的程度。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列宁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9]在一定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0]。为了生产出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的意识形态文化形式，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会根据本时代的生产关系和阶级需要，将本阶级文化上升为社会主流文化，并对这些文化进行阐释改造，为自身阶级统治服务。不同的社会个体也必然会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由于社会个体的社会分工不同、所处的社会关系不同，每个人对待同一事物的立场、方法、观点也会千差万别，因而对文明的关注点和理解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进而将影响到个体对文明的判断，以及由此而渐进发生的推进文明发展的程度。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还依赖于一定的心理机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一定的文明认知为前提，为一定的文明情感所驱动，以一定的文明行为实现为依归。在心理学理论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精神的幻象，它突出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心理因素，与人的文明认知、文明情感、文明行为相互贯通、密切相连，知、情、意、行四大基本要素构成了这种文明心理的有效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构建过程中，主体的内部结构是处于有意识的状态之中，而外部形式则以一定的文明行为表现出来。文明主体坚定的文明意识具有自觉性的特点，它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凝聚和积淀起来的，一旦形成就会存在于主体的深层意识中，甚至存在于无意识中，展现出深沉、持久、坚强、坚韧、有力、优秀的品质。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制约性

唯物史观坚持客观物质世界的先在性、第一性、本原性，主张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同时，唯物史观也承认意识、思想、观念等精神文化现象对物质具有明显的能动作用，即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改造、创造功能。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1]文明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能力的一个体现，对人的文明行为和社会实践生活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下，认识不到文明的这种主观能动作用，就会陷入文明虚无的窠臼而不能自拔。相反，如果夸大了这种能动性，就有可能滑向文明决定论、唯文明论的危险。

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有目的的文明自觉。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的存在着。”^[12]人作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另一重要形式的精神文化生产的主体，在精神文化生产伊始，就紧紧围绕着“观念的存在着”的目标和蓝图而进行。在精神文化活动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主体的文明需要、文明动机、文明愿望、文明情感等内容综合为“目

的”，结合并指向一定的客观现实生活，从而激发文明主体的创造性功能和精神力量，推动文明实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的意味着文明主体对现实与规律的一种体认。当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仅限于这种体认，它还将通过文明的选择，文明手段、方式、方法的应用，来发动、调节、整合、驾驭和控制文明主体的动机、情感、愿望。这种强劲的文明内驱力一旦生成，就排斥、剔除妨碍自己目的运行的一切糟粕，从而达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实然与应然的有机统一，以此使文明主体前进一步，甚至几步，并使其向行动转化，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性指向。正如恩格斯指出：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3]

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能动性功能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一是文明认同。不同的文明个体或群体基于相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明理念、相似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对自身文明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作用、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有着深刻的认知。这种肯定和积极的认知使文明主体确立了一种“以我为主”的基本立场，即对自身文明的礼敬、自豪和坚守，从而生发出主体内心对自身文明价值正向认知和评价的自信感受。二是“现实的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中“现实的人”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唤醒和彰显了文明主体意识的确证和回归，突出了“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基于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力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也应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的价值取向。三是创新意识。创新是标志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的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蕴含对自我文明的有效确认，也内含在此基础上对自我文明的反思、批判与再创，这种“破”与“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激发着文明主体的创新意识。以自由、理想、探索、改革、求实、变动不居的创新精神使文明主体逐渐表现出一种更加积极的

状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主体能动性功能的发挥,成为推动文明进步更为强劲的内驱力。

最后,正确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制约性的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列宁指出:“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14]文明主体在文明实践的过程中,只有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才能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现的程度、作用社会实践的活动方式、效率以及最终的效果,将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一定的具体情境下发生。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能动性只有也只能通过实践途径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得到体现。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5]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人的主体精神动力因素,要想化成精神的闪电,迸发出巨大的威力,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就不能脱离物质生产实践。实践使文明主体摆脱了停留在意识、思想、精神层面的打转转、兜圈子,通过一系列的物化的活动,即文明活动和文明行为,也就是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使自己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成为对象的本质规定,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指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16]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与一定社会存在相适应的中华文明的积极肯认和向善向新发展,是在长期的文化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在实践的层面,当代中国应通过提高文化生产力、推进“第二个结合”、共享文化成果,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格局、叙事与前景,从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第一,提高文化生产力,筑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根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塑造和提升,受文明的主客体条件制约,而其中文化生产力起基础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生产力的种类做了区分,除了通常我们说的物质生产力以外,还有“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即文化生产力。文化生产力融合精神的价值体系、物质的符号体系、行为的制度体系,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体现。如上文所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下,物质生产力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可能,而文化生产力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的又一动因和最直接的外化形式。高度发达的文化生产力,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当代中国,随着经济强劲崛起、文明程度大幅提升,文化生产力显著提高。但是,文化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却没有与物质生产力齐头并进,没能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面对这些问题,要着眼于解决制约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构建科学合理文化生产关系,要调动生产要素活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一是调动生产要素活力。文化生产力包括主体、客体和中介等要素。从文化主体来讲,需重视文化人才作用的发挥。人才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的代表,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第一资源。围绕发展文化生产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从事文化生产工作的领导、管理、创意、研究、营销、策划等人才队伍是关键。从文化客体来讲,需盘活文化资源。对名胜古迹、神话传说、民族节庆等文化资源,不但要加大开发、利用、转化和保护的力度,还要深度挖掘其思想价值和市场潜力,使其成为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从文化中介来说,需融入高新科技。科技进步是文化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17],不断融入高新科技,强化科技与人文

的对接融合。二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提高文化生产力的现实路径。一方面,要深化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社会多元服务供给主体,从粗放式、数量型、外延式的产业发展模式转到集约式、质量型、内涵式发展轨道上来,不断推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的优秀文化产品,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另一方面,要充分激发资金、人才、文化资源等多种要素活力,统筹协调文化产业布局,突出文化发展特色和重点,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最佳资源配置和优化整合。三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践的发展推动了现实生活深层次的改革。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变革史。一方面,要在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上不断创新,科学合理处理好企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搞好文化的生产、管理和繁荣。另一方面,要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科学定位和细化分类,健全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和市场体系,确保文化生产经营灵活、高效运转。

第二,推进“第二个结合”,掌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和文化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18]“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中,“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共通之点、契合之处,并使二者融为一体,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是激发文化主体的创新创造能力。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思想和理论进步,都是一次大的文化创新创造。创新创造是文化的本质特征,

也是文化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内在动力。没有创新创造,文化就不会发生发展;没有创新创造,更不会造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文化创新创造主体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自觉、对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自觉,以及对文化责任和担当的高度自觉,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二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是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价值载体,决定文化前进的方向和发展道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会长期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蚀和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切实增强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自觉性坚定性,建设好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是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当今世界文化国力的角逐较量日益激烈,西方文化话语权较强的态势一时难以改变,我们需要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加快推动中华文化迈出国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同时,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中,我们也要做到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扬弃观的基础上,融合再造丰富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在互促互鉴中达致和合共生。

第三,推动文化成果共享,涵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底蕴。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规定,它深刻反映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文明进步跃迁的洞察和思考。马克思曾指出:“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9]

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承继了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培育共同精神家园、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成果的人民共享，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最强动力。

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观。文化源于人民，理应回归到人民，并为人民群众所服务。马克思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20]一方面，人是文化的建设者和发展者；另一方面，人又是文化的受教育者和接受者。在人的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统一过程中，文化发展影响着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制约着文化发展。因此，文化实践必须围绕人，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展开。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正确文化价值观，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才能深入群众、服务群众、提升群众，真正做到文化发展成果共享。

二是培育共同精神家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既需要物质家园作为人的安身之地，又需要精神家园作为人的立命之所。底蕴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为中华民族精神共识的凝聚、精神支柱的铸造和精神能量的激发，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坚持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开放与超越，积极弘扬中华文明的底蕴、智慧、气度和境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培育和构筑起中华民族于灵魂深处最根本、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家园。

三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视界下的共同富裕不仅包含物质文明，还包含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价值原则在现代社会文化利益分配中的集中彰显。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全民共享、全面共享为根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使文化资源、文化设施、文化成果和文化服务在全国范围获得更合理、更有效和更均衡的充分利

用，努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18]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N]. 人民日报, 2023-06-03(1)、(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
- [4][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152.
- [5][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258、258.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 [9]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
- [10][15][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0、11、689.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8.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8.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2.
- [14] 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57.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666.
- [17]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责任编辑：张丽

实然·应然·必然：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三维辨析

胡成琢 郑天骄

摘要：“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发展的新认识、新论断。从实然逻辑看，“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文明发展道路探索中生成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从应然形态看，“新的文化生命体”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用”，实现“魂”“根”“用”三者有机统一的理想状态；从必然进路看，“新的文化生命体”要成长壮大，要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持“两个结合”的文化发展原则，实现“新的文化使命”的发展目标，继续谱写文化繁荣发展、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新篇章。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新的文化生命体；两个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1]“两个结合”是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概念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为资源、以“两个结合”

为发展路径，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而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新的文化生命体”一经提出即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界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诸多探讨。陈立旭（2024）从古今中西之争切入，论述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刘梁剑（2023）和张梧（2024）将“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等同，前者从三个层面论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后者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探讨了“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世界历史

收稿日期：2024-09-02

作者简介：胡成琢，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新中国史；郑天骄，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专项课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底蕴与实践根基研究”（2024VSI004）、华东师范大学“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项课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叙事研究”（2023ECNU-XWHSX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意义，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经由“第二个结合”而造就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韩庆祥、楼俊超（2024）则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提出、内涵、理论之用和实践之用，对“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现有研究基本以宏大叙事为主，鲜少进行中微观研究。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中观层面，研究“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的实然逻辑、演进的应然状态与发展的必然进路，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探索回答“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何生成、建设什么样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及如何建设“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问题。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实然逻辑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以来，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和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华文明丧失了原有的生机活力，面临发展困境，亟须一股力量来激活其生命力。在危难时刻，中国仁人志士纷纷探索中华文化的发展方案，“中体西用”“文化化合论”“文化调和论”等求索方案层出不穷，但最终都没能解决中华文明的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彻底激发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最终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一）文明蒙尘：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遭遇的发展困境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华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对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和持久的影响。中华文化何以成为一个生命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体，为何要破旧、求新呢？

“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概念从词义学上讲是一个复合性名词。“新”是相对于“旧”而言，是用来修饰文化生命体的形容词。“生命体”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即有生命形态的独立个体。借

用“生命体”这一生物学的概念来描述文化，“就是将文化看作有生命力的，强调文化不是静态的、孤立的、封闭的，它也遵循着一般生命体生长发育、进化发展、新陈代谢等规律，社会性、连续性、发展性和开放性是任何一个文化生命体的根本特性”^[1]。这准确概括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特质，兼收并蓄、开放包容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与独特优势。长期以来，正是这种文化特质使得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近代以来，清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使得原本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因封闭而日益僵化、落后，丧失了原有的生机活力。在封建制度的禁锢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严重受限，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西方。中华民族旧有的文化生命体因而失去了生机活力，亟待新因素、新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创新创造力。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凭借着工业文明的优势对中国发起了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落后的旧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侵略、冲击下，遭遇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发展态势就此展露于国人面前，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因此跌入谷底，中华文化遭受沉重打击，中华文明遭遇空前挑战。至此，如何改变中华文化的落后状况、实现中华文化的转型发展，成为国家文化领域面临的现实困局。

（二）上下求索：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出路的探寻

在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仁人志士被迫反思中国发展的未来出路，开启救亡图存的斗争。从器物图强到制度变革，再到政治改革，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经济、军事转向政治，最后聚焦于文化，开始从文化维度探索中国的发展出路，试图通过思想文化变革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文明的赓续更新。

“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革除社会弊端、挽救民族危亡开出的一道药方。体、用是中国哲学的传统理论范畴，具有多重含义。“体用范畴的一个主要含义是讲本质与现象或原则与应用的关系，另一个含义是指实体与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4]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之“体用”是第一层含义，即以中国固有的为指导原则、以学习西方的为具体应用，坚持“器变道不变”，坚守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中体西用”成为该阶段中华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挑战的基本模式。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不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将眼光转向了中学与西学的“会通”。由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于西学之“用”的认识从器物到政治制度，从物质文明到政治文明，最终将着眼点转移到思想文化、精神文明上。然而，当中华文化的发展需要对传统的“体”进行改变之时，不可避免地会与“中体西用”所要维护的“体”产生矛盾与冲突，“中体西用”论就会成为中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阻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化系统论”“文化化合论”等观点横空出世。这些思想以系统观念来探究中华文化发展问题，认识到中华文化自成体系，是一个文化系统。“关于将东西文化相结合缔造‘第三新文明’或‘新文化系统’的中华文化发展图景，接近于新时代关于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远景擘画。”^[5]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自具特征（如文字构造之特殊，如法学上所谓法系之特殊，如是种种甚多），自成体系”^[6]。梁启超则走得更远，提出了“文化化合论”，将中西文明“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7]，并且进一步提出“新文化系统”的概念，探讨了新的文化系统的生成路径，即“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8]。这说明梁启超在此时已经认识到了新的文化系统的生成过程是一种化学反应，而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但这种“化合”忽视了文

化的时代性，缺少一种文化的革新。

此外，一些学者亦运用生物学、进化论的原理来探讨中华文化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调和论”的观点。杜亚泉借用斯宾塞“高等生物体之机关，各具机能，互相依傍，即定形与调和之进步也”这一生物学原理，推之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认为“人类社会之进化，亦为同一法式”^[9]，提出了“文化调和论”的文化发展策略。为了详尽地阐明中华文化发展的“救济之道”，杜亚泉再次借用了生物学、医药学的知识，将西方文明的输入比作病毒输入人体，指出“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他继而提出救济之策不在“竭力防遏西洋学说之输入”^[10]，而在于“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11]。很明显，这里杜亚泉不仅将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一个系统来看待，而且提出了将西方文化调和、整合于本国文化系统内的观点。同样，“调和论”亦更多注重文化的民族性，而对文化的时代性有所忽视，从而给当时迅猛发展的新文化带来一些阻力。

李大钊也曾主张“文化调和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问题所在，“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庸）讳言”^[12]。同时，他表达了对复活民族文化、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坚定信心。李大钊认为，要达到“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这一目标，就需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13]。由此可见，李大钊已然认识到，应实现中西文化的结合，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为世界文明作贡献。但在这个时期，李大钊过于强调调和而轻视了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对革命的消极态度。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他的这种调和思想逐渐褪去。在《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一文中，李大钊提出：“我劝主张调和的人歇歇罢！那进行

不息的时代,才有调和的真本领呢!”^[14]可以看出,李大钊的调和思想逐渐消退,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华文化的出路。

(三) 基因激活: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启蒙更新

“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15]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先进的思想理论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

一方面,“激活”指的是刺激有机体内某种物质,使其活跃地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第一层含义在于唤醒,使中华文明在精神上清醒过来,恢复发展的自觉意识。“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6]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便为救亡图存中的仁人志士带来了一份希望,为中国人开辟了一方精神上的新天地,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后,“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7]。唤醒的关键在于内在契合,高度契合才能灵魂相通,才能同频共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扎根中国大地,就是因为其“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8]。无论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价值立场的坚持,还是在哲学考量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展现出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使得二者在中国近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一经相遇,便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这里的激活还有“赋新”的含义,即“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19]。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时偕行”“革故鼎新”等思想高度契合,激活

了中华文明的创新特质,激励着中华民族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精神实现自身文化的发展进步。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其先进的理论体系引领着中华文明完成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具有创新发展的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得其更加贴合中国实际,具有更加强大的理论感召力和思想引领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东方大地扎根并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武器,关键就在于其强大的科学性、真理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以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指导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应然形态

经过百余年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遵循“两个结合”的文化发展路径,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是简单的“拼盘”,也不是与世隔绝的空中楼阁,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20],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用”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系统。

(一) 固本培元:以马克思主义为“魂”

“新的文化生命体”是理论创新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之魂,以完备的科学真理统摄着整个生命体。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奠定理论基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制高点”^[21],始终能够以其科学的真理、人民的立场、实践的品格、发展开放的体系统摄全局。马克思

主义以科学的思想伟力,将其自身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结合在一起,进而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使“新的文化生命体”更为立体、多维,实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指引“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前进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成长关键在于解决好方向的问题,否则极易容易长歪、走偏。因此,在发展道路上有一个指引者至关重要,而马克思主义自近代以来就一直担任着文化发展的指引者角色。纵览中国近代史,“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22]。在近代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号,但由于缺乏科学、正确的理论指导,无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没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辟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新道路。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继续以此为指导,固本培元,确保“新的文化生命体”沿着正确的方向成长壮大。

(二)斯文在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

“新的文化生命体”根植于中国大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坚实的根基,不仅滋养其成长,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滋养。任何一个生命体都需要能量来促进自身的生长发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代发展壮大的依托,其蕴含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统传统、家国情怀等,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23],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丰厚的生命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大同的天下观、民为邦本的社会观、厚德载物的

道德观等,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积聚的智慧精华,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生长的重要养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24]因此,新时代推进“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必然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时代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根据时代发展需求,提炼与时代相契合的话语,为现实所用。同时,要紧跟时代特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坚持守正创新,在汲取其精华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增添新的发展内容,使之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相适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支撑。任何生命体要立得住、站得稳,都需要坚实的根系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根”,以其深厚的底蕴为生命体夯基固本。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决定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根深。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进程中,经历过无数的苦难与挫折,但每一次都没有被击倒,而是愈挫愈勇,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5],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决定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多种内容,并呈现出多民族文化色彩。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推动了文化交流互鉴,形成了色彩斑斓的中华文化。“新的文化生命体”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不仅扎得深而且铺得广,可以获取不竭的精神动力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三)兼收并蓄:以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用”

“新的文化生命体”要健康成长,不能故步自封、与世隔绝,而应开放包容,充分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通过交流互鉴,可以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当然,借鉴不是盲目的,也不是照抄

照搬或被动接受，而是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积极汲取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兼收并蓄，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

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发展提供丰富养料。任何一个生命体都需要养料来维持生长和促进健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与开放包容的特质，为“新的文化生命体”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营养提供了可能。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文化生命力，正是因为其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禀赋，使其能不断从其他文明中汲取营养。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构筑了色彩纷呈、生机盎然的世界文明百花园，我们要秉持学习的态度，汲取其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26]。

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要坚持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结合自身国情，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世界的。作为特定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应特定需要创造的文明形态，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学习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契合时代发展要求、满足民族发展需要、切合文化发展方向。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充分考虑自身文化状况、发展要求来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满足自身文化生命体成长的营养需要。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必然进路

推进“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建设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两个结合”为遵循，固本培元、植根铸魂，不断推动文化更新和现代化发展。

（一）政治引领：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的全面领导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政治保证，为“新的文化生

命体”的形成与发展指引前进方向。

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关键在党。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创新创造的民族禀赋两个优势^[27]。这些优势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引领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锻造了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在近代中华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激活文明基因、挽救民族危亡的救治良策，找到了“两个结合”的文化发展路径。坚持党的领导是事关中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性问题。只有坚持党对文化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发展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关键在党。文化之为生命体，在于其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和生命更新之中。“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发展与巩固是一项长期性事业，必须始终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者与坚强领导者，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就是要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坚持文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和指导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具体实际为现实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与其他文化生命体的交流互鉴中汲取营养，造就一批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从而增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力。

（二）正本清源：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发展的基础。主体性是生命体的基本属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8]。文化主体性对内表现为高度的文化自信，对外表现为强大的文化引领力、感召力和辐射力，呈现出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认知。“新的文化生命体”唯有树立文化自信，坚持独立自主，不断巩

固文化主体性，方能筑牢成长壮大的根基。

一方面，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仅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一个国家、民族自立自强的基本依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行稳致远，就必须有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近代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发展态势，使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跌落谷底，进而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声音，将中华文化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两个结合”激活中华文明基因，恢复了民族自信心，守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29]

另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和底气，中国具体实际是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基础，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这两大基本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复兴、探索自身文化发展道路的宝贵历史经验。百余年来，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国大地上独立探索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文化发展成就。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结合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实际，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三）守正创新：坚持“两个结合”的发展原则

“两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的路径遵循。文化关乎国运、国本，“两个结合”的文化发展路径对于中华文化保持旺盛生机活力至关重要。“两个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守正又创新，始终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源头活水，保持“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机活力。

一方面，要坚持守正，固根守魂。守正守的

是“两个结合”之“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之“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两个结合”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之魂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只有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才能保证我国文化建设不偏离正确航道。第二，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生存发展的根基，我们既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挖掘提炼蕴藏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精华，又要坚决杜绝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要坚定走自己的路，从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中认识中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而是要在传承的同时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

另一方面，要坚持创新，与时俱进。创新激活发展动力，开拓发展进路。从根本上说，“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与发展的创新动力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共同特征。“两个结合”作为新的文化发展路径，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一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引领中华文化走向现代。“第二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30]，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的互促共进，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拓展中华文化的理论生命，不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内涵，推动文化繁荣和文化强国建设。

（四）旧邦新命：实现“新的文化使命”的发展目标

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是“新的文化生命体”

发展的核心目标。“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旧邦新命，就是要贯通历史和现实，从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入手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推进文明立世、文化兴邦，实现“新的文化使命”。

只有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才能彰显“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价值所在。“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31]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三者相互联系，构成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推动文化繁荣是基础，离开这一地基，其他两部分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建设文化强国是推动文化繁荣的阶段性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支柱，没有这一发展目标与重要支柱，文化繁荣将会迷失方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会失去支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迈上新台阶的必然结果，是质的飞跃，是从文化到文明的升华。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的文化生命体”旧邦新命的集中体现。“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3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物质载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全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共同体”^[33]。新时代，实现“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旧邦新命，就是要时刻保持“最大的政治”的清醒意识，把握其前进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四、结语

“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华文化发展更新的结果，“新的文明生命体”的生成、发展呈现了中华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实然、应

然、必然主要探讨“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一个有机体，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生命发展周期。“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不是从无到有的，而是从旧的文化生命体演化而来的。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势不可挡、中华文明蒙尘的现实状况是中华文明作为一个生命体所面临的生态系统，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的实然境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文化建设中探索形成的文化发展图景，也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应然形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秉持“两个结合”的文化发展方式，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发展的必然进路与未来成长的必然趋势。总之，随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将不断实现现代化转型，不断谋求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2][15][19][28][29][30][31][3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6、7、7、7、9、9、9、10、11.
- [3] 吴艳东, 廖小丹. 新的文化生命体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标识与建设理路[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3): 45.
- [4] 方克立. 马魂 中体 西用: 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22.
- [5] 樊士博, 郑天骄.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理论界标及其文明启示[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24(3): 72.
- [6]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7.
- [7][8] 梁启超. 梁启超游记: 欧游心影录 新大陆游记[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45、48.
- [9] 周月峰.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杜亚泉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47.

- [10][11] 杜亚泉. 迷乱之现代人心 [J]. 东方杂志, 1918(4): 6、7.
- [12][13] 李大钊全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313、313.
- [14] 李大钊全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03.
- [16]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1(7): 9.
- [17]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6.
- [18]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J]. 求是, 2020(1): 6.
- [20]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J]. 求是, 2023(20): 6.
- [2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0.
- [2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
- [2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 [N]. 人民日报, 2015-12-31(1).
- [24][26]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13、10.
- [25]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J]. 求是, 2022(14): 7.
- [27] 齐卫平, 郑天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6): 9.
- [33] 洪向华, 张光泽.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探颐与价值意蕴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1): 9.

责任编辑: 赵晓锋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出场语境和呈现样态

谢欣桦 邓显超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出场有其特定的思想、文化、历史和实践语境,其深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的话语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滋养,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的话语淬炼以及新时代文化实践场域的话语塑造。这一话语体系在回答文化层面“四个之问”中逐步积累和凝练:在回答“中国之问”中,创造了以文化强国为目标的特色话语;在回答“世界之问”中,创造了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共识话语;在回答“人民之问”中,创造了以美好精神生活为追求的人民话语;在回答“时代之问”中,创造了以建设现代文明为使命的创新话语。这一话语体系言之有理、言之有术、言之有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的集中体现与凝练表达。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出场语境;呈现样态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的要求。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当前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背景、内涵要义、思想特质、理论贡献和当代价值等进行系统论述,明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题主线、核心构成、立场方法,契合习近平文化思想学理化、体系化的时代要求,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体系研究趋

于深入。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容,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出场语境及呈现样态,对于进一步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学理化、体系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出场语境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出场有其特定的思想语境、文化语境、历史语境和实践语境。从理论道路的指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的话语指导;从中华文脉的赓续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滋养;从

收稿日期:2024-10-20

作者简介:谢欣桦,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邓显超,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影响力提升的话语叙事研究”(24BKS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百年文化征程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受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话语淬炼；从当代实践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受新时代文化场域的话语塑造。

（一）思想语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的话语指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的话语表达和阐述方法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2]新的话语体系首先着眼于既有思想理论的奠基。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魂脉。这就决定了在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的话语为其提供了方向指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话语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形成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文本表达中鲜有提及“文化”这一表述，而是用观念、精神、意识形态、哲学等词语阐述对有关文化理论思考。一是关于文化的形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文化形成的一般规律性作出了界定，他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3]，“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清晰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话语的中心思想，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5]的理论来源。二是关于文化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而“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7]，阐明了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内在规律性。基于此，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将文化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文化自信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8]。三是关于文化的价值立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9]，说明文化应当在各民族的交流互鉴中体现其价值，指出文化的人类关怀。根据这一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新的文化使命”的价值立场导向。四是关于文化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10]。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以及“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11]的创作立场与创作导向。五是关于文化的功能属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文艺育德”，即文学艺术等精神生产活动能够起到无产阶级道德教育、塑造无产阶级新人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文化的“唤醒”及“振作”功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应该用独到的思想启迪、润物无声的艺术熏陶启迪人的心灵，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12]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形成发展、文化地位作用、文化价值立场、文化发展的评价尺度、文化的功能属性等一系列经典话语的阐述，更是在与新时代的互动与共演中生成了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等一系列创新话语。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的具体话语样态能够跨越时空彰显其真理性与科学性。同时，能够立足新的时代语境，进一步明确其话语指向与话语标识，丰富其话语表达与话语塑造，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学理化、道理化与哲理化。

（二）文化语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义精华和话语表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内生根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3]。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义精华中汲取思想价值，从独具特色的民族话语范式中探索表达方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于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所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价值情感、人文精神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提供了思想智慧、价值内核与话语逻辑。首先，从思想理念来看，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先后涌现出守礼爱人的孔孟之道、道法自然的老庄之学、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格物致知的宋明理学……这些思想精髓经过不断交流、糅合、发展，成为完整而稳定的中华文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延续民族文化血脉”^[14]的底气来源之一。其次，从价值情感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天下为公”的大同情怀、“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革故鼎新”的精神气质、“自强不息”的奋斗品质、“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等核心理念，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赖以繁荣发展的精神体系，为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情感底色，这正是深刻理解和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依据。最后，从人文精神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括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仁爱正义、推己及人的为人处世之道，敬业乐群、孝老爱亲的道德规范，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审美品格，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辩证思维等精神智慧，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表达方式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提供了话语范式。历经岁月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展现出坚持和合共生、开

放创新、人民至上的表述特质，同时摒弃了分裂对立、狭隘闭塞、精英主义的话语，而这些特质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列话语表述提供了重要参考坐标。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促进文明包容互鉴并行一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这与“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15]异曲同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6]，这与“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17]高度契合。

（三）历史语境：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文化建设的话语淬炼

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推进文化建设，通过探索文化建设的理论理解与经验表达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话语资源。“任何话语体系的当代形态，都不是横空出世的，都不能与特定历史和传统根基相脱离。”^[18]因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系列实践中，不断拓展文化的内涵、创新文化的形式、深化文化的表达以及拓宽文化的视野，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本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用“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9]来说明文化建设的地位，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0]来说明文化建设的纲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1]“古为今用、洋为中用”^[22]，对待外来文化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23]这类言简意赅的话语来说明文化建设的方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

小平在科学研判社会主义发展态势的前提下，作出社会主义建设“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4]的判断，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指导性话语；江泽民强调发展先进文化，认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5]，进一步凝练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话语；胡锦涛提出，“要用时代的要求来审视宣传思想工作，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宣传思想工作，以改革的精神来推动宣传思想工作”^[26]，强调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并结合新的时代环境提出舆论宣传、对外宣传等系列时代性话语。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承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系列话语中进行了话语凝练与话语创新。在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要求“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7]；在文化的发展方针上，指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28]，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29]，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0]；在文化的建设使命上，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31]。

在百年文化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和要求，形成了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话语、关于文化发展的路径动力话语、关于文化创新的体制机制话语，塑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从党的领导人的文化话语要素中汲取话语养分，创造出系列具有时代表征又兼备现实关切的标识性话语，在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的同时建构起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

（四）现实语境：新时代文化实践场域的话语塑造

新时代文化实践的叙事话语与实践指向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建构勾勒了多元而立体的话语场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些无疑都是新时代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源头活水，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水平指导话语。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为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为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的两个重要维度。这两个维度，一个代表时间发展的纵向进程，另一个代表空间变化的横向扩展。文化强国战略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为理解这一话语体系提供了坐标轴；这些坐标轴的交点，共同构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现实语境，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坐标系。

就国内局势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出场与文化强国战略的推进相伴而生。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2]因此，我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作用，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基础支撑作用。正是在研判国内文化发展态势和总结文化强国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即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生成了一系列与强国建设紧密相关的话语体系，包括文化领导型话语、文化价值型话语、文化目标型话语、文化主体型话语等。

就国际形势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出场是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需要。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33]文化对话已成为当今国际交流中的一个重大议题。然而，我们在对外宣传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如“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叫不响”等。因此我们越来越重视文明

交流互鉴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构建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叙事和话语体系,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正是在研判国际文化发展态势和探究文明交流互鉴可行路径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与文明交流互鉴密切相关的文化话语,包括文化信息型话语、文化交流型话语、文化传播型话语、文化国际型话语等。

新时代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主流舆论思想持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中国的形象也更加可信、可爱、可敬。随着文化成就的涌现,文化话语也在不断进步,在助力文化繁荣、文明兴盛的同时也受到其反哺,实现了体系化的建构与发展。在两个大局的现实话语场域中认清话语语境,利用更高水平的文化话语来阐述中华文明,以更生动的叙事技巧来传播中国故事,以更完善的话语体系来发出中国声音,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的呈现样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包括思想旗帜、时代课题、目标任务、发展道路、实践进路和理论主题等,涉及文化发展的方向、思路、道路和目标等基础问题,并涵盖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文学艺术、文化传承、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哲学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的谋划与部署。这一思想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前瞻性、独特性和引领性的概念、范畴和表述,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34]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正是在回答文化发展的“四个之问”中,生成了具有原创

性和科学性的自主话语体系。

(一)回答“中国之问”:创造以文化强国建设为目标的特色话语

何为文化“中国之问”?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分析:“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35]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当代中国,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一系列事关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文化“中国之问”亟须破解。在回答文化“中国之问”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了以文化强国建设为目标的系列特色话语,为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转变提供了系列话语支持。

第一,在回答文化“中国之问”中,生成了一系列目标任务型特色话语,这一类话语表述高屋建瓴,在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擘画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蓝图。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方位上,生成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话语,即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回答文化“中国之问”的过程中,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三个方面入手,部署了未来文化建设重点任务,并提出将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化目标话语;同时,对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阐释,生成了现阶段的文化任务话语。

第二,在回答文化“中国之问”中,生成了一系列保障体系型特色话语,这一类话语简明扼要,强化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举措。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了如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发展的最大增量等话语,从而形成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根本保

障话语。同时，提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立起适应形势的制度规约，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话语。此外，积极促进文化强国建设落到实处、细处、深处，针对新闻舆论、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基础制度型保障话语。

第三，在回答文化“中国之问”中，生成了一系列实践路径型特色话语，这一类话语表述条分缕析，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体建设进路。既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核心魂脉的要求，又关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源泉根脉的现状，将这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形成了“两个结合”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要求话语。同时，致力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用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来涵养人，形成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进路话语。此外，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形成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实践路径的根本遵循话语。

概言之，为回答文化“中国之问”，习近平文化思想衍生出以文化强国建设为目标的一系列目标任务型、保障体系型、实践路径型系统话语，在话语创新中彰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为进一步建设文化强国筑牢根基。

（二）回答“世界之问”：创造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共识话语

何为文化“世界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36]大变局带来大挑战，涌现出大量亟待回答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课题。世纪疫情阴霾未散，局部冲突硝烟又起，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潮，中国共产党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回答了这些关乎全球发展的系列文化“世界之问”。在回答文化“世界之问”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系列共识

话语，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话语保障。

第一，在回答文化“世界之问”中，形成了一系列文明共识话语，这一类话语表述胸怀天下，为人类面对共同的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一是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从而生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愿景旨向话语；二是旨在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建构起反映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从而生成了超越不同文明价值共识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三是认识到“地球是人类共同生活和守护的家园”^[37]，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进而提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话语。

第二，在回答文化“世界之问”中，形成了一系列交流共识话语，这一类话语表述聚焦现实关怀，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方案，正是在回答文化“世界之问”中，生成了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的三大倡议话语。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发展、安全和文明三者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并将这一交流共识话语视为推动人类共同迎接挑战、共创未来的重要标识。当今世界不应以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分歧作为交流的主旋律，而应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提出提倡以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作为交流的旗帜，从而形成有利于推动世界秩序重构的共识话语。

第三，在回答文化“世界之问”中，形成了一系列合作共识话语，这一类话语表述立意高远，为推进人类社会贡献了中国力量。提出倡导并践行大国责任，坚持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充分尊重各国差异，并建立起多边合作机制。这促成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形成。同时，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始终以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的角色，扩大与各国的利益交汇。因此，生成了关于

全球南方、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合作共识话语。

概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共识话语深入人心，不仅回答了文化‘世界之问’，也应对了全球共同挑战。这些话语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涵盖了文明共识话语、交流共识话语、合作共识话语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大党大国的天下情怀和责任担当，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夯实基础。

（三）回答“人民之问”：创造以美好精神生活为追求的人民话语

何为文化“人民之问”？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分析：“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38]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民生建设的一系列文化“人民之问”。在回答文化“人民之问”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了以美好精神生活为追求的一系列人民话语，为实现精神共同富裕提供了话语导向。

第一，在回答文化“人民之问”中，生成了一系列人民主体话语，这一类话语表述指向明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正是在回答文化“人民之问”中，我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从而生成了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旨向话语。同时，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民的中心地位，认识到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生成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话语。

第二，在回答文化“人民之问”中，生成了一系列人民服务话语，这一类话语表述见微知著，

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党属性。正是在回答文化“人民之问”中，深化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改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将其作为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补齐文化发展短板的重要途径，形成了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务话语。与此同时，认识到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从而生成了一系列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话语。正是在回答文化“人民之问”中，牢记文艺创作应当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出“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39]，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中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文艺作品，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文化惠民话语。

第三，在回答文化“人民之问”中，生成了一系列贴近人民、反映人民心声的流行话语，这一类话语激浊扬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涵养人民至上的情怀境界。正是在回答文化“人民之问”中，坚定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辅相通，从而生成了一系列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话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培育时代新风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从而生成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的大众话语。

概言之，为回答文化“人民之问”，习近平文化思想衍生出人民主体、人民服务、人民心声等方面话语，这些新话语新理论在体现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鲜活的话语创造力。

（四）回答“时代之问”：创造以建设现代文明为使命的创新话语

何为文化“时代之问”？“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40]其中所指涉的一系列与文化息息相关的重大时代课题亟待回应和解答。在回答文化“时代之问”中，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脉络，在深刻洞察中华文化发展规律与趋势的基础上生成了以建设现代文明为使命的系列创新话语，为构建文化生命体提供了系列话语范式。

首先，在回答文化“时代之问”中，生成了一系列目标型话语，这一类话语表述明白易晓，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中厘清其基本指向。正是在回答文化“时代之问”中，我们不断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示文化坐标、锚定文化航向，从而生成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41]的目标话语。

其次，在回答文化“时代之问”中，生成了一系列基础型话语，这一类话语表述根深叶茂，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其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我们认识到文化对于道路、理论、制度的重要性，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从而生成了“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42]的基础话语。

再次，在回答文化“时代之问”中，生成了一系列制度型话语，这一类话语表述鞭辟入里，为回答新的时代文化课题提供了制度保障。我们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从而生成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43]的制度话语。

最后，在回答文化“时代之问”中，生成了一系列路径型话语，这一类话语表述一目了然，在新的文化生命体建构中凸显其发展进路。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and 道义性，看到了中国具体实际的发展场域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诉求，形成了既符合中国实际又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理论、新话语。由此，提出了坚持“两个结合”的路径话语，强调“两个结合”是巩固文化主体性、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概言之，面对文化的“时代之问”，这些目标型话语、基础型话语、制度型话语、路径型话语，科学地解决了“古今中西之争”难题，表明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显示党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主动性达到了新高度。

四、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生成了分类别、分阶段、分领域的战略话语和路径话语，形成了集特色强国话语、文明共识话语、人民追求话语、创新使命话语于一体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在回答文化“四个之问”中，聚焦于文化道路、文化理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和文化力量，以及贡献给世界的文化方案和文化智慧，贯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理念、路径策略、原创贡献，建构起习近平文化思想自主话语体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这一自主话语体系言之有理，其理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言之有术，其术就是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灵活运用；言之有据，其据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系列文化发展成就的有力彰显。

参考文献：

- [1][27][28][29][34][3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3、43、42-43、43、17-18、22.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九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
- [3][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61、152、404.
- [5][11][14][33]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51、288、276、228.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1.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49.
- [8][39]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24-07-22(1)、(1).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95-196.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82.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13.
- [15][30][42][4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66、325、311、126.
- [16] 阮元. 十三经注疏: 上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56.
- [17]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4.
- [18] 崔唯航. 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实现“中国化” [J]. 人民论坛, 2018(34): 30.
- [19][20]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664、708-709.
- [21][22][23] 毛泽东文艺论集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143、227、41.
- [2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67.
- [25]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76.
- [26]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强大舆论力量 [N]. 人民日报, 2003-12-08(1).
- [31][41]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0、10.
- [32]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3.
- [35][3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30、483.
-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1.
- [4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5-26.

责任编辑: 杨玲